

## 王韜與日本維新人物之思想比較\*

徐興慶\*\*

### 摘要

本文主要在比較中國近代化過程中，致力中西文化交流與論議變法自強，集學者、報人、教育家、政論家、史學家於一身的前衛思想家王韜（1828-1897）與日本維新人物中村正直（1832-1891）、岡千仞（1833-1914）等人的思想變遷關係。

近代中國主張吸收西洋新知的前衛思想家當中，王韜自稱是魏源的繼承人，思想走在康有為、黃遵憲之前。海外發展是王韜思想轉變的重要契機，他變法圖強的主張是日本維新人物關注的焦點。王韜對日本的思想轉變是在一八七九年赴日訪問之後。當時明治維新始起，日本朝野一致積極走向世界，吸收西洋知識，以求革新之道。魏源的《聖武記》與《海國圖志》，在德川幕末傳入日本，其「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之海防思想，喚醒了許多思想家及政治家對認識西方世界的必要性之共鳴；而王韜的《普法戰紀》也成為當時日本朝野、軍方及知識分子了解世界大勢的必備之書。魏源與王韜的新思潮在中日兩國近代化的過程中前後輝映，扮演了雙方思想界的橋樑角色。

本文探討的主題有兩個方向：第一，發掘新史料，探討中村正直、岡千仞二人對王韜提出的革新思想作何回應？分析他們對王韜有何主、客觀的評價，以釐清雙方之思想異同及其變遷關係。第二，比較如何堅持傳統儒學的價值？如何攝取西學？分析其間之重要性。主要以補充相關新史料作為分析基礎，論述中日兩國在近代化過程中人物交流的思想變遷，如何提議東西文化融合的內涵？如何振興亞洲？如何改善中日關係等問題。

關鍵詞：王韜 中村正直 岡千仞

---

94.8.15收稿，95.4.20通過刊登。

\* 本文為執行 92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王韜與日本維新人物思想變遷關係之研究」（NSC92-2411-H-002-046）之部分研究成果。承蒙日本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提供相關資料及二位審稿人惠賜修改意見，謹此致謝。

\*\* 國立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 一、前言

近代中國主張吸收西洋新知的前衛思想家中，魏源（1794-1857）之《聖武記》與《海國圖志》，於德川時代末期傳入日本，其「師夷長技以制夷」之海防思想，喚起日本政治家、思想家對認識西方世界入侵東亞之覺醒。<sup>1</sup>而王韜（1828-1897）則是中國近代化過程中，介紹西方歷史、致力中西文化交流與論議變法自強，集史學家、教育家、政論家、報人於一身之前衛思想家。王韜自詡是魏源「以夷制夷」思想的繼承人，其禦夷思想走在康有為（1858-1927）、黃遵憲（1848-1905）之前。海外發展及辦報是王韜思想轉變之重要契機，其變法圖強主張引起日本維新人物的關注。王韜於一八七九（光緒5，明治12）年訪問日本，時值明治維新始起，日本朝野一致積極汲取西洋知識，努力走向世界，以求革新之道。而王韜之歐洲經驗及其編譯之《普法戰紀》亦成為當時日本政、軍界以及知識分子認識世界情勢的途徑之一。魏源與王韜之新思潮於中日二國近代化過程中前後輝映，尤其是幕末維新时期，由吸收優越的中華文明之傳統觀念，急速轉向汲取實用的西洋文明之過程中，二人於當時代中日思想界之互動與變遷扮演了關鍵角色。

學術界探討王韜與日本之關係，多以王韜遊歷日本後撰寫的《扶桑遊記》<sup>2</sup>為主要基礎文獻。依管見，日本在三十年代開始布施知足、<sup>3</sup>實藤惠秀、<sup>4</sup>增田

1 有關魏源《海國圖志》之輸入日本及其對思想界所造成的影響，請參閱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1967）；森睦彦，〈《海國圖志》の舶載から翻刻まで〉，蘭學資料研究會《研究報告》206號（1968）；大谷敏夫，〈《海國圖志》の幕末日本に与えた清代政治思想と阿片戦争〉，東洋史研究叢刊49（1995）；拙稿，〈日本近代化における中國の維新思想——《聖武記》と《海國圖志》に影響された政治家・思想家たち〉，《台大日本語文研究》1（2000），頁61-100；源了圓，〈幕末における中國を通しての「西洋學習」——《海國圖志》の受容を中心として——〉，《中日文化交流叢書三・思想》（東京：大修館書店，1995）；源了圓，〈東アジア三國における《海國圖志》と横井小楠〉，《季刊日本思想史》60（特集《近代日本とアジア》，2002）；源了圓，〈横井小楠における「開國」と「公共」思想の形成〉，《日本學士院紀要》57卷3號（2003）。

2 王韜記述訪日之《扶桑遊記》自光緒五年（1879）閏三月初七日至同年七月十五日止。《扶桑遊記》於明治十三年（1880）由栗本鋤雲主持之東京報知社支店，標註訓點出版。日本關西大學「增田涉文庫」藏有該版本。

3 布施知足，〈王紫詮の扶桑遊記〉，《遊記に現れたる明治時代の日支往來》（東

涉、<sup>5</sup>等有零星的王韜研究出現，九十年代之後佐藤慎一、<sup>6</sup>伊原澤周、<sup>7</sup>狹間直樹、<sup>8</sup>陶德民、<sup>9</sup>唐權、<sup>10</sup>等學者陸續為文探討。臺灣在六十年代雖有呂實強、<sup>11</sup>賴光臨、<sup>12</sup>的王韜研究，但鮮少論及其與日本的關係。大陸及香港方面則集中於九十年代之後，專書有忻平、張海林的《王韜評傳》<sup>13</sup>論及王韜全般之人物形象，論文則有陳建平、<sup>14</sup>李朝津、<sup>15</sup>周佳榮、<sup>16</sup>王曉秋、<sup>17</sup>稂艷玲、<sup>18</sup>孫邦華、<sup>19</sup>易惠莉、<sup>20</sup>王晴佳<sup>21</sup>等人之先行研究。中日學界關注王韜之焦點多半著重雙方人物

京：東亞研究會，1938），頁22-23。

- 4 實藤惠秀，〈王韜の來遊と日本文人〉，《近代日支文化論》（東京：大東出版社，1941）。本文後由張銘三中譯，〈王韜的渡日和日本文人〉，《日本研究》3卷6期（1944）。同氏，〈岡千仞の支那論〉，《明治日支文化交渉》（東京：風光社，1943）。
- 5 増田涉，〈王韜について——その輪郭〉，《人文研究》14卷7號（1963）。
- 6 佐藤慎一，《近代中國の知識人と文明》（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6）。
- 7 伊原澤周，〈《棧雲峽日記》《扶桑遊記》について〉，《日本と中國における西洋文化攝取論》（東京：汲古書院，1999），頁120-151。
- 8 狹間直樹，〈初期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史的考察〉，《東亞》1-3（2000-2001）。
- 9 陶德民，〈明治漢文界における清代文章學の受容—星野恒編・王韜評《明清八大家》について〉，《江戸・明治期の日中文化交流》（東京：農山漁文協，2000）。
- 10 唐權，《海を越えた艶ごと——日中文化交流秘史》（東京：新躍社，2005）。
- 11 呂實強，〈王韜評傳〉，《書和人（國語日報）》61期（1967）。同氏，〈王韜〉，《中國歷代思想家1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更新版）。
- 12 賴光臨，〈王韜與循環日報之研究〉，《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上冊。
- 13 忻平，《王韜評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張海林，《王韜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
- 14 陳建平，〈王韜の日本觀——《扶桑遊記》及び《郵便報知新聞》を中心に〉，《江戸・明治期の日中文化交流》（東京：農山漁文協，2000），頁203-214。
- 15 李朝津，〈儒家思想與清末對外關係的再思考——王韜與日本〉，林啟彥、黃文江主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圖書公司，2000），頁67-88。
- 16 周佳榮，〈在香港與王韜會面——中日兩國名士的訪港記錄〉，《王韜與近代世界》，頁375-394。
- 17 王曉秋，〈王韜日本之遊補論〉，《王韜與近代世界》，頁395-408。
- 18 稂艷玲，〈海外遊歷與王韜思想的發展〉，《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30卷（2001）。
- 19 孫邦華，〈西潮衝擊下晚清士大夫的變局觀〉，《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1年6期。
- 20 易惠莉，〈日本漢學家岡千仞與王韜——1860-1870年代中日知識界的交流〉，《近

及文化交流層面。但王韜訪日前後提倡的變法革新、東西文化交流與融合、以及如何傳承運用傳統之儒學價值與宗教思想，因應西方列強挑戰？乃至王韜與德川幕末、明治初期的日本漢學家中村正直（1832-1891）、岡千仞（鹿門，1833-1914）之思想異同為何？這些問題仍有待新史料之發掘並作深入的探討，上述問題意識為本文之研究主題。

本文探討王韜與中村正直、岡千仞二位近代日本思想家之思想變遷關係，有兩個重要方向。第一：發掘新史料，探討中村正直、岡千仞對王韜提出的變法革新思想作何回應，分析他們對王韜有何主、客觀評價，以釐清雙方之思想異同及其變遷關係。第二：探討如何堅持傳統儒學價值？如何攝取西學？其間之重要性及平衡點等問題，本文主要補充相關新史料作為分析基礎，藉以填補王韜與日本維新人物及思想比較的空白部分。<sup>22</sup>

## 二、王韜與中村正直

中村正直通稱敬輔，號敬宇，生於江戶幕臣之家。幼年隨昌平覺教授佐藤一齋（1772-1859）學儒，與桂川甫周（1751-1809）修習蘭學，又與箕作奎吾（?-1871）學英語。1855（安政2）年中村正直如願繼承師業，成為昌平覺教授。惟當時正值美國太平洋東印度艦隊司令培理（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率「黑船」二度叩關。德川幕末被卸除「鎖國」這最後一道防線，除被迫開放門戶，對外貿易制度必須重新制定外，整個社會正面臨西方自由民主風潮的入侵。值此巨變，保守的日本如何轉型？如何在以西學為尊的思潮中建立日本與世界、日本與中國之關係？在此潮流中，身為德川幕末漢學

代中國》12輯（2002）。

21 王晴佳，〈中國近代「新史學」的日本背景——清末的「史界革命」與「文明史學」〉，《臺大歷史學報》32期（2003），頁197-199。

22 筆者於日本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發掘之《清使筆語》（「特別買上文庫藏，編號2281-248-15」）為明治時期漢學者增田嶽陽（貢）與當時在日清文人之筆談記錄。內容記載雙方往來寄贈詩文及書簡，原為歷史學家中山久四郎（中山文庫）所藏。本文獻原有四冊，因前兩冊已散佚，筆者前往調查時僅存其第三、四冊，紀事時間自明治十一（1878）年十月至明治十三（1880）年七月止。對談總數超越三十次，筆談對象之日方人士除增田嶽陽外，另有岡千仞、石川鴻齋、成瀬溫等人。晚清人士則有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何子綸（何如璋之弟）、副公使張斯桂、參贊黃遵憲、隨員沈文燮、沈蘭生（沈文燮之弟）、王韜、王治本等人。其內容大體按筆談時間依序排列、整理。

家之一的中村正直，於面臨佐幕或倒幕、鎖國或門戶開放、尊王攘夷等複雜的國家體質轉換過程，提出其治國理念與抉擇。透過對西方世界之瞭解，提倡東西文化必須融合，顛覆傳統宗教觀，鼓勵普及漢學教育，其思維對明治初期日本社會之文明開化有相當程度的影響。由於王韜與中村正直之成長背景有諸多雷同，二人在日本亦曾交往，以下針對雙方思想主張之異同進行分析比較。

### （一）《普法戰紀》在日本之迴響

中村正直之《敬字詩集》中有一首七言律詩〈聞王紫詮先生西歸有此寄〉，詩曰：

漂然乘興日東遊，才學如君固寡儔，筆役風雷多逸氣，胸羅星斗足奇謀。（讀《普法戰紀》序論而知之）久思對榻縱談未，能肯命車來訪不，那忍匆匆分手去，天涯良會再難求。<sup>23</sup>

一八七九年王韜訪日短短四個月當中，只和中村正直見過兩次面，但從本詩內容可窺知中村正直早於王韜訪日之前已閱讀過《普法戰紀》，深知其人其事，不但崇拜王韜，且有相見難求之嘆。對中村正直的印象，王韜則表示：「溫厚篤摯，教誘後進，藹然可親，兼明中西學術。」<sup>24</sup>

中村正直撰寫王韜《扶桑遊記》之序文時，述曰：

嗚呼！人生朋友之際，聲應氣求，肝膽相照，千里來會，恨相見晚者，夫豈偶然哉！無非由於我有誠以感，彼有誠以應，纏綿牽合，交孚凝聚，而遂成一大盛事也。余于王弢園先生遊吾邦之事，而益有以知其然矣。憶四五年前，余於重野成齋几上始見《普法戰紀》。時成齋語余曰：「聞此人有東遊之意，果然，則吾儕之幸也。」……近來書布之士來東京，間有之；然其身未至而大名先聞，既至而傾動都邑如先生之盛者，未之有也。仰先生博學宏才，通當世之務，足迹遍海外，能知宇宙大局，遊囊所挂，宜其人人影附而嚮從也。<sup>25</sup>

中村正直形容與王韜之交情，是彼此相待以「誠」，稱讚王韜具有豐富的海外知識、博學宏才、洞悉世界大局，因此得以「身未至而大名先聞」，吸引了日

23 中村正直，〈聞王紫詮先生西歸有此寄〉七言律詩，《敬字詩集》，卷3。收入《詩集日本漢詩》（東京：汲古書院，1985），卷18，頁498。

24 王韜，《扶桑遊記》，引自鍾淑河，《走向世界叢書》（湖南：嶽麓書社，1985），頁426。

25 前引《扶桑遊記》，頁389-390。

本知識界之關注。岡千仞於〈扶桑遊記跋〉中亦提及：「《普法戰紀》傳於我邦，讀之者始知有紫詮王先生；之以卓識偉論，鼓舞一世風痺，實為當世偉人矣。」<sup>26</sup>

從上述文獻可得知王韜所以備受日本知識界矚目，關鍵在於其編譯之《普法戰紀》，因此，王韜與日本之關係必須自《普法戰紀》東傳日本談起。《普法戰紀》是一八七〇年八月起，王韜等依據英國郵電報導內容，翻譯其中普法戰爭相關紀事，加以編輯而成之文稿。文稿自一八七二年起連載於陳靄亭經營的香港《華字日報》（Chinese Mail），之後由上海《申報》轉載，普法戰爭結束後才集結成十四卷出版。<sup>27</sup>《普法戰紀》內容主要記述歐洲歷史以及普、法二國之政、經、文、教、民情風俗，且對議會君主制、武器、地圖等多所描繪。特別是王韜分析普、法二國制度面之優劣以及人民對國家之認同，評論戰爭勝敗因素。王韜所以關注普法戰爭，原因在於默默無聞的弱國普魯士竟於數月間徹底瓦解法國政權，這個意外結果使得舉世震驚。王韜認為此書之參考價值在於：「雖僅載二國之事，而他國之合縱締交，情偽變幻，無不畢具。於是談泰西掌故者，可以此為鑑。」<sup>28</sup>此書足以作為日本面對西方列強挑戰時，以弱敵強、以小搏大之借鏡，內容亦有助日本因應日趨複雜的東北亞局勢之合縱或連橫政策之參考。促成《普法戰紀》付梓刊行的主要原因，來自王韜對於香港被迫割讓給英國所衍生之恥辱感。王韜赴歐洲考察，則是晚清政府對其下達緝捕令所促成的另一機緣。晚清官僚體系下，王韜汲取西學、身體力行，算是知識分子中首開先河者。如何勝出歐洲列強，是其經常思考的問題。王韜於〈弢園老民自傳〉中曾說：

至於今日，歐洲列國輟跡幾遍天下，鶚視鷹瞵，龍驤虎踞。諸國無不拱手交讓，莫敢撓其鋒。不知彼今日所挾以陵蔑諸國者，即他日有聖人起，所以混同萬國之法物也。夫彼既割據日多，則爭競迭出；欲以誇強而侈勝，遂不得不增兵而益防；舟車槍炮之技，盡人皆同，遂不得不更出新法，思駕其上。顧彼能然，此亦能然。日後必至鬥智鬥力之俱困然後已。蓋智巧至是幾莫能加，未有物極而不反者也。<sup>29</sup>

26 岡千仞，〈扶桑遊記跋〉，《扶桑遊記》，頁513。

27 《普法戰紀》由張宗良等人翻譯自1870至1871年普魯士與法國戰爭之新聞報導，由王韜編輯，於1872年集結成十四卷刊行。在日本有1878年陸軍文庫翻刻本，1886年增補為二十卷，1887年又出現山本榮造之校勘本。

28 王韜，〈弢園老民自傳〉，《弢園文新編》，頁369-370。

29 王韜，〈《普法戰紀》後序〉，前引《弢園文新編》，頁127。

可見王韜對當時歐洲及世界局勢獨具觀瞻，針對西方文明走向以及如何應對皆有深刻認知，如何提出變法以因應新局是其日夜所思之課題。尤其普法戰爭對十九世紀後期之世界歷史影響深遠，王韜於〈《普法戰紀》後序〉中亦強調曰：

蓋以普法之戰觀之，天下大勢不極其變，則不能復。將來天下各國，必至舟車之致遠同，槍炮之利用同，兵力之戰勝同，機器之製造同。一切巧術視為長技，而後彼乃無所恃以驕人。混同之機於是乎在。故曰：「普法之戰，其變之極者也。」<sup>30</sup>

明治初期之維新人物經常將王韜《普法戰紀》與德川幕末輸入日本之魏源《海國圖志》相提並論。<sup>31</sup>上述內容即是日本朝野人士爭相閱讀《普法戰紀》並推崇王韜之關鍵所在。<sup>32</sup>

漢學家栗本鋤雲（匏庵，1822-1879）讀《普法戰紀》之初步感想如下：

吾披閱尚未及半，竊以為該書不獨記行陣之事、交戰之跡，而其中議論能脫出漢人之漏舊，此為珍貴之書。<sup>33</sup>（原日文）

栗本鋤雲認為王韜評論歐洲局勢富有創意，印象深刻，於是向重野安繹（成齋，1827-1910）、岡千仞、龜古省軒、寺田士孤等漢學家提議共同邀請王韜訪日。

一八七九年王韜訪日之際，《郵便報知新聞》以〈讀重刊《普法戰紀》〉為文，對王韜作了如下評述：

清王韜宏才能文，且身歷涉英、法諸國，地形人情，瞭如指掌，故著此書也。強弱之勢，勝敗之數，及軍伍佈置，糗糧運輸，一讀如足踏其境、目睹其狀。敘事之妙，殆乎逼盲史。而其戰法則各國所俱用，以視周漢年代悠遠，弓車九廢，無取於今者，相去遠矣。由是觀之，盲腐之史可不讀，而斯書不可廢也。刻以行於世，亦可謂深知世變者矣。<sup>34</sup>

30 同上注，頁129。

31 有關德川幕末日本思想界對魏源思想之受容，請參閱拙著，《近代中日思想交流史の研究》（學術叢書，京都：朋友書店，2004），頁83-123。

32 《普法戰紀》之單行本於1873年秋出版，日本《郵便報知新聞》主筆栗本鋤雲之子栗本貞次郎隨岩倉具視（1825-1883）訪歐美使節團過境上海時購回。

33 栗本鋤雲，〈王紫詮之來遊〉，日本史籍協會編，《匏庵遺稿》（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5），頁392。

34 1879年9月9日《郵便報知新聞》。

《普法戰紀》為漢文譯著，內容又有助日本瞭解歐洲戰事背景及其民情風俗，透過漢文之逐譯功能，得以吸收西方資訊。對日本漢學家而言，藉由此種途徑，得以強調漢學的實用性，用以抗衡日益強勢的漢學無用論之說法，並可印證東西文化足以融合並存於日本社會之可行性，此為日本漢學界積極邀請王韜訪日的另一主因。

## （二）譯書及東西文化思想之互動

王韜從中書西譯到西書中譯，除發揮將中學西傳的功能外，遊歐之後更深知吸收西學的訣竅，對「中西合一」有獨特見解，其思想引起維新時期日本思想界之高度重視。中村正直與王韜同樣具有歐洲留學經驗，他一向關注西歐進步的政治、法制及宗教問題，回國後更藉由西書日譯之管道，將先進的西學知識與制度注入日本社會，發揮文明開化之功。

### 1. 王韜之譯書歷程

一八四八年王韜的上海行，首次對西方文明留下深刻印象。一八四九年九月，王韜應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之邀赴上海「墨海書館」（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Mission Press）從事翻譯工作。十餘年譯書生涯中，王韜與英國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香港「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院長）合譯《中國經典》（*Chinese Classics*）系列圖書，費時近三年，先後完成《尚書》（第三卷，1865）、《詩經》（第四卷，1871）、《春秋》及《左傳》（第五卷，1872），<sup>35</sup>將中國經典介紹到西方國家，扮演著文化傳播者之重要角色。十九世紀《中國經典》在西方陸續出版後，引起英國漢學界重視，英國著名漢學家霍理斯（Lionel Giles）稱讚說：

五十餘年來，使得英國讀者皆能博覽孔子經典者，吾人不能不感激理雅各氏不朽之作也。<sup>36</sup>

英國愛丁堡大學特頒漢學獎及榮譽博士學位給理雅各。一八七六年英國牛津大學開設漢學講座，特聘理雅各為首任漢學講座教授。張海林指出理雅各這些殊榮有一半應歸功於王韜之助譯。<sup>37</sup>段懷清也指出王韜幫助理雅各的具體表現有

35 前引張海林，《王韜評傳》，頁101。在此之前理雅各與英國傳教士聖約翰（John Chalmers）、留美學生黃勝等人已完成四書之翻譯，為《中國經典》第一、二卷。

36 朴庵，〈王韜與理雅各〉，《國風》創刊號（1934）。

37 前引張海林，《王韜評傳》，頁103。



二：一為輯錄歷朝歷代各種對於儒家經典的評點注釋文本；二是將中文文本和漢字索引中所隱含的內容揭示出來，並體現在翻譯文本當中。<sup>38</sup>

一八五七年，王韜在上海墨海書館曾與倫敦傳道會傳教士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編輯漢語月刊雜誌《六合叢談》，<sup>39</sup>內容涵蓋人文科學、自然科學、宗教、各國資訊等諸多領域，是將當時西洋各國資訊及近代文明介紹給東亞世界之首部雜誌，其間王韜並為麥都思的《新約全書》中譯本潤稿，使其文本較具文學色彩。王韜之思想轉變始於一八六七年十二月隨理雅各赴英國考察後，當時王韜比晚清派往西方國家之外交使節團早七年抵達歐洲，滯留歐洲兩年多，實踐了「百聞不如一見」之古訓。蘆濱玲形容王韜歐洲行是「從一個孤芳自賞的封建文人，轉變為憂國憂民的資產階級政論家，講求經世致用之道。」<sup>40</sup>

一八六七年在理雅各協助下，王韜赴歐洲遊學兩年，直接接觸西方文化，使得王韜思想產生極大轉變，其主張之變法革新背後始終隱藏著西方的思維模式。在推動西學東漸的貢獻方面，王韜對研究西方歷史情有獨鍾，超越以中國為地域、以中華文化為核心之本位價值觀，比較中西體制的優劣，引進西方先進國家的優點，作為改革中國落伍體制的藍圖。王韜研究西方歷史，除了《普法戰紀》與《法國志略》外，亦重視岡千仞翻譯的《美利堅志》、《法蘭西志》以及岡本監輔的《萬國史記》。就王韜之《法國志略》而言，最初十四卷係根據江蘇巡府丁日昌之《地球圖說》編輯而成；日後增補的《法國志略》，內容有不少參考岡本監輔翻譯的《萬國史記》及岡千仞翻譯的《法蘭西志》。王韜訪日後除蒐集日本方面之英譯著作外，更匯集江南製造局編輯的《西國近事匯編》、英美傳教士私人著述以及在華中外報紙紀事，於一八九〇年擴編《法國志略》為《重訂法國志略》二十四卷。<sup>41</sup>王韜藉學習西方各國歷史之途徑，汲

38 段懷清，〈理雅各與晚清中國社會〉，《漢學研究通訊》24：2（總94期，2005），頁47。

39 《六合叢談》經由貿易商船將西洋世界之情報帶入日本，對幕末、明治初期之日本知識分子有深遠的影響。目前日本全國二十多所圖書館收藏有《六合叢談》之和刻本。本書也是研究近代語彙的珍貴資料之一，對中日近代文化交流史、中日近代漢字新詞彙及學術詞彙之發生、科技史研究等皆有影響。內容除刊載近代語彙史、科學史、思想史等相關論文外，附錄有十九世紀漢譯洋書日本所在目錄、總語彙索引、影印本文等資料，價值頗高。相關研究已由沈國威編成《「六合叢談」（1857-58）の學際的研究》（東京：白帝社出版，1999）。

40 蘆濱玲，〈漫遊東西洋的清朝文人王韜〉，《中外文化交流》3期（1997），頁53。

41 見王韜輯撰，《重訂法國志略》凡例，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版。

取君民共主政體之知識，力圖對晚清腐敗的官僚體制之改革提出建言。

## 2. 中村正直之譯書歷程

一八六六（慶應2）年，德川幕府爲了汲取英國學術，從幕府朝臣子弟中招募年輕學者，經過「開成所」<sup>42</sup>的考試後，篩選出十四名優秀學子前往歐洲留學，中村正直亦名列其中，當時年三十五歲，是其中最年長的留學生。中村正直幾乎與王韜同時抵達英國，其目的是留學，而王韜則是考察。二人皆深受西學影響，因此各自對本國提出之變法思想，推動西學東進的作法可謂殊途同歸。由於德川幕府政權面臨危機，中村正直留英不到兩年即被迫回國，並於一八六八年擔任靜岡學問所<sup>43</sup>教授，一八七〇年起在靜岡先後翻譯英國蘇格蘭作家斯邁爾斯（Smiles Samuel, 1812-1904）之著作《西國立志編》、<sup>44</sup>英國哲學、經濟學家密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之著作《自由之理》。<sup>45</sup>《西國立志編》與福澤諭吉（1834-1901）之《西洋事情》、內田正雄（1838-1876）之《輿地誌略》同列爲「明治三書」，同爲明治初期西洋文明啓蒙之暢銷書，影響當時日本的民權思想極深。中村正直翻譯《自由之理》，不但成爲明治初期重要的自由民權之核心思想，也間接鼓吹日本自由主義思想的形成。例如當時自由黨領袖河野廣中（磐州，1849-1923）<sup>46</sup>於一八七三年閱讀《自由之理》後，隨即興起革命意念，說道：

截至目前為止所受教育皆爲漢學、國學體系，向來動輒提倡攘夷思想。然今日一夕之間，已知應興起大革命，重視人之自由、權利，

42 「開成所」由江戶幕府創立，原爲教授荷、英、法、德、俄各國洋學知識之學校，1863年改稱「洋書調所」，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後改稱「開成學校」，1869年改稱「大學南校」，1871年改稱「南校」，1877年之後成爲東京大學的一部分。

43 原爲德川藩的學校，又稱靜岡學校，是當時代表日本政府之最高學府。

44 原名《自助論》（*Self help*），1859。中村正直譯，《西國立志編》計十一冊，爲明治初期最暢銷的書籍。內容敘述數百名西洋古今人物之立志傳記及個人主義道德說，這種打破階級制度，倡導有能力、肯努力者皆有出頭機會，合乎時代潮流的思想，激勵並影響了許多日本年輕人思想走向。若說《西國立志編》日譯本爲日本近代化之精神支柱（backbone）並不爲過，本書被許多小學列爲教科書，作爲啟發學生修身之用。明治時代之總發行星超過一百萬冊。

45 原名《自由論》（*On Liberty*），1859。

46 河野廣中，明治初期之政治家，出身福島縣三春。爲東北自由民權派之核心人物，曾於1882年因鼓吹自由民權運動，引發「福島事件」被捕入獄。之後歷任日本眾議院議長、農商務大臣，晚年致力於日本的普選運動。

自覺應以廣泛民意為基礎推行政治，銘感至深，內心已描繪出自由民權之信條，此對余之生涯為極重大之轉機。<sup>47</sup>（原日文）

此外，與中村正直同時代之自由民權運動理論的指導者植木枝盛（1857-1892），其主張之自由論點亦受到密爾《自由論》之影響。<sup>48</sup>

一八七三（明治6）年7月，留美歸國的森有禮（1847-1889）<sup>49</sup>號召明治初期啓蒙家與新知識人西村茂樹（1828-1902）、西周（1829-1897）、津田真道（1829-1903）、加藤弘之（1836-1916）等人成立日本最早的近代文明啓蒙運動團體「明六社」，<sup>50</sup>中村正直亦在成員之列，當時他們介紹歐美近代價值觀的天賦人權、功利主義等思想，乃是日本之後出現自由民權運動、大正民主主義（Democracy），甚至於日本憲法產生的原動力。

日本的自由民權運動起於《明六雜誌》刊行之一八七四年，其主要訴求是成立國會、制定憲法、減輕地租、樹立地方自治以及廢除不平等條約。這些主張與「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三大改革政策同時並行。諷刺的是明治政府卻在此時遂行「富國強兵」，強行出兵攻打臺灣、製造朝鮮江華島事件，併吞琉球，遭致國際社會輿論抨擊。中村正直翻譯的《西國立志編》適於日本自由民權運動盛興期一八七〇年刊行，特別在推行「文明開化」的內涵上，引起日本社會各階層廣泛的迴響。中村正直於《明六雜誌》中，共發表〈西學一斑〉、〈人民之氣質改造說〉、〈製造善良之母說〉、〈支那不可侮

47 明治文化研究會編，《明治文化全集》（東京：日本評論社，1967），卷5，頁2。

48 宮城公子指出植木枝盛的自由論主張是以明六社之「人生三寶說」為基礎，再從翻譯書中獲得密爾、史賓塞（Herbert Spencer）、邊沁等人的英國功利主義、自由主義思想而形成的。詳請參閱宮城公子，〈日本の近代化と儒教の主体〉，《日本史研究》295號（1987）。宮城之論文已由許婷婷譯成中文出版，收入張寶三、徐興慶編，《德川時代日本儒學史論集》（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頁243-277。

49 森有禮（1847-1889）出身薩摩（今鹿兒島）藩士，德川幕末曾赴歐美留學。回國後成立「明六社」為國家建言，導入新政。擔任文部大臣期間，曾公佈學校令，奠定日本教育制度之基礎。因為森有禮是歐化主義者，於日本帝國憲法頒佈當天遭日本國粹主義者暗殺。

50 「明六社」因成立於明治六（1873）年而得名，是明治新政府成立後，文人雅士結社之濫觴，由森有禮發起，社員有西周、西村茂樹、大槻文彥、加藤弘之、田中不二麿、津田真道、津田仙、辻新次、中村正直、九鬼隆一、畠山義成、福澤諭吉、杉亨二、箕作秋坪等人，可謂集當代啟蒙思想家於一堂。所發行之《明六雜誌》雖然壽命很短（自1874年3月至1875年11月），但刊載內容涵蓋批評明治社會的百般現象、時事評論與急進主義之新思想。

論〉、〈賞罰毀譽論〉等五篇論稿。<sup>51</sup>中村正直強調日本欲達到近代化目標，首應重視日本人之精神改造，若人民氣質無法提升，品行無法良善，則日本政體之改造亦無法成功。一八七五（明治8）年與大槻愛古共編的《愛敬余唱》漢詩集中，中村正直寫了一首「愛敬歌」，其內容如下：

嗚呼！今之世人欠缺子弟之溫情，夫妻反目，朋友相互詬病。至於邦國之交際，則專注兵力以競爭，妖氣充斥神州，何時焉得洗淨！<sup>52</sup>  
（原日文）

憂心明治初期日本民心未能淨化，專注於富國強兵引發社會亂象，隱射明治好戰分子不應攻打臺灣、覬覦朝鮮、併吞琉球，表達對主戰者誤導強兵政策之不滿。此外，中村正直於詩集《礫川集·書感》中，更明白反對「征韓論」，曰：

何物唱征韓，非愚則狂耳。我欲曉其人使自知其否。敵小不可侮，古人謀猶是。勿利鄰國難，其言亦可採……古今尚德者，國運可隆起，尚力而好戰，亡滅立至矣。<sup>53</sup>

可惜明治政府從不理會中村正直對改善內部、淨化人心之訴求，更忽視其主張安內先於攘外之遠見，而一味朝發展軍國主義之歧途前進。

近代日本浪漫主義（Romanticism）先驅北村透谷（1868-1894）曾稱讚中村正直為明治初期「內部的改革家」，以凸顯其與另一位「外部的改革家」福澤諭吉在當時日本思想界佔有之地位。北村對中村正直之評語如下：

敬宇先生非改革家，乃適用家。雖為溫和保守之思想家，然致力將泰西文物注入日本。狹意而言，調和了東西文明。非但救儒教、道教於日本末路，更使泰西之天地自然萬物適用於日本社會。具備儒教中華思想，亦崇敬斯邁爾斯之《自助論》，為其率真之選擇。無熱心追求之事業、無執著之崇拜，但有溫和之崇敬心。有適用、抉擇及崇敬之心，故免於淪為明治革命思潮之迷兒。屹立於眾多主張漢學思想之學者中，從容順應革命時局，為明治之思想界立功，皆因擁有此等特性使然。敬宇先生非偉大之改革家，然堪稱思想界偉人之一。其思想對新舊世界而言，有罕見之調和能力。福澤翁（諭

51 高橋昌郎著，日本歷史學會編集，《中村敬宇》（東京：吉川弘文館，1988），頁146-147。

52 松村操編，〈敬宇先生詩文偶抄〉，《文學》33卷10號（1881）。

53 《中村敬宇》，頁148。

吉)與敬宇先生實為新舊二大潮流中,最易辨識之指標。<sup>54</sup>(原日文)透過北村透谷敏銳的觀察力,洞悉中村正直於明治初期思想界發揮了其應有之影響力。上述評語可約略窺知中村正直主張日本不應全盤西化,而須重視漢學教育與東西文明之調和。中村正直憂心長年深植日本社會之儒教思想及漢學教育凋零消失,因此翻譯密爾自由思想之評論或贊文中,刻意納入大量漢語表現詞句,同時積極闡揚孔子學說。另一方面,中村正直銘感於西洋社會具有高度道德水準,先後完成《西國立志篇》(全11冊,1871)、《自由之理》(全5卷6冊,1872)、《共和政治》(全3冊,1873)、《西國童子鑑》(全3冊2卷,1873)、《西洋品行論》(全12冊,1878-1880)等西書日譯工作,藉以喚起日本年輕人及知識分子重視修養、提昇品格、建立志趣理想、鼓吹自由民權信念,進而推動近代化的思想改革熱潮。

中村正直認為西方國家之所以強盛,是因為人民篤信天道,人民有自主之權而法律公正,政通人和使然。日本推動思想改革應首重端正年輕人的品行,品行好則風俗美,風俗美則國家自成一體,自然和諧;品行不佳者若掌兵事,則易陷入好勇鬥狠,國家則無法長治久安。中村正直的想法顯然是受到斯邁爾斯「國之強弱,繫於人民之品行」的思想影響。中村正直亦認為天生民,人民同享安樂、同修道德、同學知識,豈能分此強彼弱、此優彼劣。因此主張國與國之間應以學問、文藝交流,利用厚生之道,相互資益,彼此安康,共謀福祉。如此,萬國必能和諧,何來強弱之比較、優劣之競爭、兵甲槍砲之使用。可見中村正直是一位非戰論者,其反對日本併吞琉球,亦由此思想衍生而來。

斯邁爾斯的《自助論》曾是英國最暢銷書籍,經中村正直逐譯成《西國立志篇》後,復於明治社會引起廣大迴響,當時所有版本銷售量超過百萬冊,至二十世紀初期此書仍持續廣受中國知識分子重視。舉例而言,梁啟超於《清議報》中稱讚中村正直曰:

其(《西國立志篇》)振起國民之志氣,使日本青年人人有自立自重之志氣,功不在吉田(松陰)、西鄉(隆盛)下矣。今將其原序錄出,雖嘗鼎一臠,猶足令讀者起舞矣。<sup>55</sup>

易惠莉於評論中亦指出:

中國新銳的知識界對於《自助論》以及中村文章的理解,都是立足

54 勝本清一郎編,《透谷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70),卷2,頁173-174。

55 1899年9月《清議報》第28號,「飲冰室自由書」欄。

於國家政治的意義，而非立足於個人道德精神的意義。<sup>56</sup>

說明譯書內涵可提供中日知識分子多角度之思考。儘管中日之間在認知上有不同詮釋，但是中村正直無疑藉由翻譯此一媒介，發揮了西學東漸之功能。<sup>57</sup>

儒家文化與近代西洋文明相互衝突時代，王韜主張「中西合一」，提供晚清官僚在西化過程中一個可行方向；中村正直則強調「西學與漢學並重」。二者皆致力東西文化之融合，堪稱西學東漸之推手。於攝取西學過程中，王韜與中村正直雖然都受到西方傳教士的影響，仍同時擁有保守與革新兩種性格，透過譯書管道，宣揚東西文明無須衝突，只要瞭解互補共存之重要性，既可保有儒家文化之核心價值，又可將西方文明引入中日文化脈絡，藉此思想主張推動本國之制度改革與變法，二人採取的方法不謀而合。

### （三）王韜之「重民」思想

王韜與中村正直皆曾經考察英國之政治制度，王韜之政治理念中，有一「君治天下必須以民為先」之「重民」思想。王韜於〈重民〉上篇提及：

上有以信夫民，民有以愛夫上，上下之交既無隔閡，則君民之情自相浹洽。今夫富國強兵之本，繫於民而已矣。<sup>58</sup>

於《循環日報》中亦曰：

國之大患，莫若民情壅於上聞。比之一人之身，元氣不通，則耳目失其聰明，手足艱於行動。國之有民，亦猶人身之有元氣也。<sup>59</sup>

以王韜之認知，國家之間的對抗與競爭，富國強兵固然重要，主政之君若能培養民氣、得民心支持，國家必能立於不敗之地，因此人民是國家元氣所在；若民情無法上達，則容易造成君主施政誤判，偏離治國正道，此為真正的國家大患。

王韜於〈重民〉中篇又曰：

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亂？失民心而已。民心之得失，在為上者使之耳。民心既得，雖危而亦安；民心既失，雖盛而亦蹶。

56 前引易惠莉論文，頁192。

57 中村正直翻譯《西國立志篇》雖是西書日譯，但其各篇皆有比重不少之漢文序文。翻譯《自由之理》亦是如此。反映了中村正直強調中西並重之治學態度。

58 王韜，〈重民〉，收入李天綱編校，《弢園文新編》（香港：三聯書店，1998），頁23。

59 同治12（1873）年12月26日《循環日報》「本局日報通啟」。

欲得民心，是在有以維持而聯絡之。……平日治民之要，在撫字以結其心，勇敢以作其氣，忠孝節義以厲其心志，清徭薄賦以養其身家，務使安其居、樂其業，可敬而不可動，而忠君愛國之心自油然而生於其中。……即如英國，屹然三島耳。其地不足當中國數省，其民不足當中國二大省。而民心團結，有若長城，遂足恃之以無恐。我中國誠能收民心為己助，其何向而不利？可使制梃以撻堅甲利兵而有餘矣。<sup>60</sup>

王韜舉出英國人口、面積雖不及中國，然民心團結，故國力堅強，對外擴張則有恃無恐。隱喻晚清政府平日未能安撫民心、激勵民氣、養民給民於安居，因此無法孕育民對國之忠、對君之愛，喪失民心之國，自然難以抵抗西方列強入侵。

王韜於〈重民〉下篇再度強調：

泰西之立國有三：一曰君主之國，一曰民主之國，一曰君民共主之國。……如英，如意，如西，如葡，如噠等，則為君民共主之國。……泰西諸國，以英為巨擘。而英國政治之美，實為泰西諸國所聞風向慕，則以君民上下互相聯絡之效也。<sup>61</sup>

又於〈紀英國政治〉中述及：

英國之所恃者，在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親，本固邦寧，雖久不變。<sup>62</sup>

基本上王韜融合西方國家以民為本之治國理念，強調君民應相互依持、上下通達，國家主體是人民而非君主。從君主角度談撫民、厲民、養民、愛民的問題，旨在為改革晚清之君主專制體制提出建言。王韜主張之「重民」思想實為中國自古以來《尚書》所言「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以及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之民本思想。

#### （四）中村正直的「人民自主之權」思想

中村正直翻譯《西國立志編》開宗明義曰：

論曰：國所以有自主之權，源於人民有自主之權，而人民有自主之

60 王韜，〈重民〉，李天綱編校，《弢園文新編》，頁23-24。

61 同上注，頁25-27。

62 王韜，〈紀英國政治〉，《弢園文錄外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卷4，頁89。

權，源於其有自主之志行。……

余近日閱讀西國古今俊傑之傳記，其皆有自主自立之志、有艱難辛苦之行，本於敬天愛人之誠意，而能實行濟世利民之大業。<sup>63</sup>（原日文）

中村正直藉翻譯《西國立志編》傳達贊同近代西方思潮東漸之主張，強調國家自主之權來自人民自主之權，二者的權力並無輕重之別。

中村正直於《敬宇文集》卷五〈英史紀略序〉中提及：

期待自由之權、公平之法、上帝之道，得與天下公享共用。英國苟能不失此三者，則其永保祥福庶幾可也。<sup>64</sup>（原日文）

進一步強調因人民自主之權而產生的國家，其自由、公平及宗教之道也應該由人民共享。因此《西國立志編》中隨處可見原著者斯邁爾斯強調「人民自主」之思想。例如第一篇〈論邦國及人民之自助〉中曰：

一國之貴，貴在人民，其價值則在人民力量之整合。<sup>65</sup>

〈邦國之盛衰〉篇中亦述及：

邦國雖有自主自立之權，其自主之基礎在於人民品行之上。……雖為霸政之國，其人民若能各自自立，則不至產生極惡之徵兆。且無論何種政體，舉凡壓制人民自立者，即可稱之為霸政（或虐政）。<sup>66</sup>（原日文）

《西國立志編》第二篇〈論發明創造新機器之人〉則提及英國所以富強，在於依賴奇器新法之發明，而這些新機器的創造者，多為至賤至貧之平民。<sup>67</sup>藉此呼籲英國政府及其社會，應以民為貴、以民為尊。

中村正直不斷強調人民應該擁有自立自主權，無疑受到斯邁爾斯的思想主張影響，這也是其急欲普及於日本社會之政治理念。不過，王韜與中村正直的「重民」思想有其不同之處。王韜的重民是君民上下對舉，人民不是一種獨立身份；而中村正直主張的人民自主自立權，等同於立國的自主自立權，不將人

63 《中村敬宇》，頁47、49。

64 《中村敬宇》，頁50。

65 斯邁爾斯(Smiles Samuel)著，中村正直譯，《西國立志編》（東京：講談社，1981），頁55。

66 同上注，頁60。

67 同上注，頁105-106。



民以獨立身份看待。

### （五）王韜與中村正直之西洋宗教觀

日本在明治維新大改革中，為追求建設日本新理念而加入基督教信徒行列者為數不少。中村正直赴英留學前，從魏源《海國圖志》的描述中得到「英俗貪悍，尚奢嗜酒，唯技藝靈巧。」<sup>68</sup>之負面資訊。但在實地考察英國之後卻說：「前年遊英都留二載，漸察其政俗，而知其不然。」<sup>69</sup>批評魏源提供的資訊與事實有明顯落差。不僅如此，返日後中村正直所持英國觀及宗教觀也有了極大轉變，回國後撰寫《請質所聞》之宗教思想即逐漸接近基督教教義。一八七一（明治4）年十一月六日九州伊萬里（今佐賀縣）有六十七名基督教徒被捕。當時日本為了廢除不平等條約，政治家岩倉具視（1825-1883）帶領使節團正在歐美考察。日本迫害宗教自由之舉，引發歐美人士強烈抗議，基督教徒雖然於五天後獲得釋放，但已造成重大外交事件。為此，中村正直於一八七二年以匿名方式發表〈擬泰西人上書〉一文，公然挑戰德川幕府對西洋宗教的祖法，闡述西洋諸國富強的原因乃根源於基督教之敬愛精神，希望日本社會認清基督教是帶動歐洲文明之主要因素。中村正直並呼籲日本若欲躋身近代國家之列，有必要認知基督教精神、承認基督教之存在，甚至大膽直諫日本天皇不妨以身作則，率先受洗成為基督教徒，顯見當時中村正直之宗教思想急遽向基督教靠攏。一八七四（明治7）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中村正直與養子中村一吉於東京接受其招聘的英文教師 Kakkuran 傳教士之受洗，正式成為基督教徒。<sup>70</sup>中村正直認為日本政府為了遂行富國強兵，一方面積極攝取西洋近代文明，另一方面卻禁止基督教進入日本是不近情理，因此主張應該儘速解禁，倡議外來宗教必要說。基督教的基本精神就是眾人平等，鼓吹前述人民應自立自主之思想，但這種觀念是否適合當時的日本社會，大多持保留態度，這也是中村正直之西洋宗教觀遭受時任昌平黌教授的考證學者安井息軒（1799-1876）嚴厲批評的原因之一。<sup>71</sup>

對於外來宗教遭受排擠，中村正直與王韜在提議修正禁教祖法之觀點上，

68 同上注，緒論，頁53。

69 同上注。

70 《中村敬宇》，頁132。

71 針對〈擬泰西人上書〉，安井息軒曾作〈與某生論共和政事書〉，嚴厲批評中村正直：「足下嘗遊於我門，與聞忠孝仁義之說，非純從事洋學者之比也。是以敢一言之，苟也與彼徒附和，以唱共和之說，其罪甚於不知而為之者，請自此絕，勿再踵我門。」

其實有諸多類同之處。日本於明治中期再次掀起對基督教的排擠論戰，傳言科學愈進步，宗教就愈走向滅亡之路。一八八七（明治20）年五月八日中村正直以「漢學不可廢論」為題發表演說，其與基督教內容有關者如下：

隨著學術日益精進，教法之真理亦日益得証。視耶穌教為奇怪之說，謂源自猶太未開化之國。則今日文明諸邦拓展之電信、鐵道時代為何？其大要有二。一曰：上帝即真神、即造物主、即真君、即真元、即中國所謂以天為其教之根本。二曰：其救靈之說深切符合人類好生惡死之情。中古英國碩學者培根曾言：「淺薄之宗教學理鼓勵人心崇信上帝，深奧之宗教學理鼓勵人心歸於天道。」<sup>72</sup>（原日文）

中村正直為宗教存在之必要性辯護。

王韜甚早與外國教士交往，但是起初對西洋宗教教義及其在華傳教活動均持負面看法。甚至同治末年上廣州太守書中曾經斥基督教為異端，曰：

不論天主、耶穌教派，均足為人心風俗之害。所以官不予禁止，民不予斥責，乃是其傳播之權，載在條約。欲使正學昌明，異端衰息，只有用明許暗禁之法。<sup>73</sup>

然而，王韜赴歐洲考察，頻繁接觸西洋宗教人士，深入瞭解其教義及精神後，對基督教的態度轉趨持平。關於宗教與「道」之關係，王韜認為：

法（教法）苟擇其善者，而去其所不可者，則合之道矣。道也者，人道也，不外乎人情者也。苟外乎人情，斷不能行之久遠。故佛教、道教、天方教、天主教，有盛必有衰。而儒教之所謂人道者，當與天地同盡。「天不變，道亦不變。」<sup>74</sup>

王韜於英國牛津大學講學之際，答覆聽講者詢問孔子之道與泰西所傳天道之別時，指出：

孔子之道，人道也。有人斯有道。人類一日不滅，則其道一日不變。泰西人士論道必溯原於天，然傳之者必歸本於人。非先盡乎人事，亦不能求天降福，是則仍繫乎人而已。夫天道無私，終歸乎一。由今日而觀其分，則同而異；由他日而觀其合，則異而同。前聖不云

72 《中村敬宇》，頁228。

73 呂實強，〈王韜〉，收入王壽南主編，《中國歷代思想家》1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局，1999更新版），頁184。

74 王韜，〈中西教法〉（《扶桑遊記》節選），《弢園文新編》，頁362。

乎：東方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請一言以決之曰：其道大同。<sup>75</sup>

王韜認為擇善的宗教法則是人情之道，違背人情即無法行宗教之道，東西方的宗教皆然。其對儒教或孔子之道的解釋是「天不變，道亦不變」之鐵則，此道能否求天降福，歸乎傳道之人是否本於人情行道而已。當時王韜比較東西宗教思想，帶給西方的宗教界人士諸多的想像空間，間接也對理雅各等人的宗教文化觀產生了影響。而中村正直強調宗教的道德學雖繫於人為因素，但非單靠文字或書中道理即可修飾出來，必須真正貫徹道德之內涵與修行。基本上，王韜對基督教是先反對後接受，但弘揚儒教或孔子之道卻是貫徹始終；而中村正直自始至終未曾反對基督教，對弘揚儒教學說於日本社會，不遺餘力。二人均認為基督教教義或儒教學說都必須透過實踐才能普及於社會，用之於人民。

#### （六）儒教道德與基督教信仰並重說

王爾敏指出王韜於一八五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咸豐4年閏7月3日）加入基督教接受洗禮，受洗時英文名稱王蘭卿（Wang Lan-King）。<sup>76</sup>王韜受洗之際，美國長老教會派駐中國之傳教士丁韞良（Marin William A. P., 1827-1916）於寧波刊行《天道溯原》三卷，有多種版本普及問世，此後廣受中國知識分子愛讀，此書亦於德川幕末東傳日本。其內容針對難理解之基督教義理論，作系統性的科學敘述，大膽主張信仰基督教之絕對性，倡議儒教道德與基督教信仰問題並不相互矛盾，此說被受儒教教育之中國知識分子適度肯定。<sup>77</sup>張海林批評王韜雖然加入基督教，卻非虔誠之基督徒，在情感上並不喜歡基督徒。又說王韜對基督教義之理解總是脫離不了儒家思想範疇，其書信、日記中經常出現讚賞及批評西方宗教之文字。<sup>78</sup>王韜常以儒家思想傳播者自居，從反對洋教到接受洋教，過程複雜，有其現實面之考量，綜觀其翻譯作品，很難找到一味讚揚基督教義之內容。因此，將王韜之宗教觀定位為以宣揚儒教道德為主、基督教義為輔，或較為貼切。

75 王韜，〈講學牛津〉（《扶桑遊記》節選），《弢園文新編》，頁356。

76 王爾敏，〈王韜早年從教活動及其與西洋教士之交遊〉，收入林治平主編，《近代中國與基督教論文集》（臺北：宇宙光出版社，1981），頁279。

77 丁韞良，《天道溯原》（出版地未詳：文泉影印出版，1967）。范蓉埭於序文中提及：「《中庸》之言與耶穌之教，非惟不相悖而適以相成。」又此書卷末附有「徐光啟奏留天主教疏」（頁135-140），是吸引中日知識分子適度接受的原因。

78 前引張海林，《王韜評傳》，頁64-67。

《天道溯原》對日本明治中期的基督教界影響深刻，當然也吸引了在靜岡任學問所教授的中村正直之注意。為使日本人進一步瞭解儒教道德與基督教信仰之關係，中村正直將《天道溯原》標註訓點，一八八一（明治14）年於日本刊行，對於基督教義及西方文化在日本之普及做出極大貢獻。<sup>79</sup>儒教道德與基督教信仰不相互矛盾之說，獲得中村正直的認同。中村正直表示：

余嘗作〈擬泰西人上書〉，世之儒者或以余助其異端，嘩然而攻之。然余實乃敬仰孔子，始終未變。且深盼孔子之道能盛行於上流社會，成為治平之大本。<sup>80</sup>（原日文）

說明自己雖然提議開放西洋宗教，但依然是孔子之信徒，頗有駁斥安井息軒等人批評其挑起明治社會「異端」之含意，中西文化並存於日本上流社會，實則為其一貫堅持之理念。

晚清第二任駐日公使黎庶昌（1837-1898）曾稱讚中村正直之人格形象為：

敬字為人，純白簡易，立身有本末，無隨俗俛仰之態。壯歲走歐羅巴，改求當世之所謂洋學，盡得其術以歸，能識其文字，又能用漢音，讀中國之書。然敬字意恒在通東西之故而劑其平，不泥古，不薄今，舍己短，取人長，深合漢儒實事求是之旨，豈非君子之用心而能若是乎。<sup>81</sup>

對中村正直致力中西文化融合之宏觀思維給予高度評價。此外，易惠莉亦論及主張東西方思想融合促使中村正直由對外「用強」論轉變為非戰論者，諸如反對征韓論、併吞琉球<sup>82</sup>等侵略亞洲之行爲。<sup>83</sup>

儒教道德思想牽引了中村正直之和平正義主張，而〈擬泰西人上書〉挑戰德川幕府宗教政策之行爲意識，代表其勇於突破傳統窠臼，印證其堅持儒教道德與基督教信仰並重之宗教觀。

### （七）中村正直與漢學教育

79 在此之前，中村正直曾於1878（明治11）年，擔任原胤編《新約聖書》（和漢對譯）之訓點工作。

80 《中村敬字》，頁98。

81 黎庶昌，《敬字詩集》序，收入《詩集日本漢詩》，頁433。

82 1879年10月1日的《申報》，曾刊載中村正直之〈沖繩志〉前序，敘述其反對日本併吞琉球之立場。

83 前引易惠莉論文，頁186。

中村正直一八七二年曾於東京之大藏省翻譯局工作，之後創立訓盲啞院，對日本的女子教育、幼兒教育、視力聽力障礙者教育貢獻良多。中村正直歷任東京大學教授、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校長、貴族院議員，一生致力教育工作，重視漢學教育之存在，呼籲日本社會普及漢學。一八七九年五月王韜訪日期間，中村正直於東京創設「同人社女學校」，強調宗教自由、漢學教養與西學吸收同等重要，因此在漢學課表中編入「輪講」、「講義」（經史類、文章類、作文）、「素讀」（和漢近易之書類、翻譯書類）。<sup>84</sup>中村正直呼籲不可忽視漢學教育，這種想法與其他西學急進派思想家相較，算是落伍，故被評為「保守」。

明治初期，日本的漢學教育已擋不住朝野傾力吸收西方文明之熱潮，往日興盛景象每況愈下。中村正直感嘆曰：

當此時棄漢學如土苴。或有漢學者鬱憤不堪，於不平之餘，入海而致死。……以吾譯《西國立志篇》十部交換善本《佩文韻府》，書肆欣然而有喜色。至佛書則更甚。<sup>85</sup>

一八八三（明治16）年四月十六日中村正直應東京大學邀請，於「古典講習科乙部」之開學典禮發表演說時指出：

觀夫方今以洋學稱名家者，無非是有漢學之質地而活用洋學者。無漢學之根基者，或七、八年或十餘年留學西洋歸國後，雖嶄然露其頭角，其乏運用之力，殊至於翻譯而決不能下手。然則今日在朝野之間，推卓然顯眾有用之人物，亦可斷言無非漢學者也。唯以漢學為裏，洋學為表而已。……夫如此時漢學書生何背明治之維新，獨不負明治之維新，欲云於明治維新之有勳勞，其豈可得哉。<sup>86</sup>

「古典講習科乙部」為東京大學文學部附設單位，靠政府特別預算營運，有別於專授「國學（日本學）」之「古典講習科甲部」，以講授漢學為主，是專為培育漢學人才而特別增設的科系。<sup>87</sup>中村正直感於時下漢學教育逐步凋零，趁機呼籲年輕學子把握得來不易之學習機會。並認為留學西洋者將來或可在日本社會嶄露頭角，但若無漢學基礎將缺乏運用能力，難以肩負推動東西文化融合

84 前引《中村敬宇》，頁164。

85 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明治的漢學家》（臺北：學生書局，2002），頁144。

86 《明治的漢學家》，頁146。

87 東京大學「古典講習科乙部」於1885（明治18）年福澤諭吉喊出「脫亞入歐」口號之際，即停止招生，1887年縮短修業年限為三年，1888年廢科。總共只送出兩屆四十四名畢業生。

的祥和社會之重責大任。寄望「古典講習科乙部」學子能「下數十年後，成鴻儒碩匠之種子」，<sup>88</sup>以挽救日本社會攝取「漢學」與「洋學」之失調現象。

中村正直雖然重視漢學教育，但在其文集第二卷〈論經學〉中，明白批評漢學、宋學同為「以經為羽翼」而標榜學派；<sup>89</sup>又在文集第一卷〈論學弊疏〉中，主張排斥非現實性的學問。他批評當時日本的漢學教育是「務於虛文，疎於實用，其能通當世之務者，百之一二而已」，<sup>90</sup>中村正直也指出學校的漢學教育是徒於粉飾太平，他說：「今之所謂學者，徒思文字章句之末節即精疲力憊，如何顧其實用？高談性命，肆說仁義，細析毫芒，至於錢穀財賦之事，茫然不曉。曰：「彼非吾事，亦其不知非恥也」。故今所謂學者，不究其行而究其書，不究其事而究其理」。<sup>91</sup>中村正直指出明治初期漢學教育式微的原因在於堅持學派及缺乏實用性，因此如何讓漢學教育的實用性與洋學的應用性結合，是他當時迫切思考的課題。

中村正直另有一項專長，酷愛漢詩使其特別擅長古詩之創作，故又被稱為漢詩人、文章家，歿後留有《敬宇詩集》四卷。<sup>92</sup>與中村正直交往五年之久的黎庶昌，於《敬宇詩集》序文中讚許曰：

敬宇生平著述甚富，其古文尤自成家，波瀾態度，不滯不溢。余嘗為藏名山文序，粗發其凡，詩特餘力所及耳。而其意趣頗與白、陸為近，余尤喜其中多諷諫之詞，若仿白氏文集體例，以諷諭間適感傷等。<sup>93</sup>

又，曾赴日本遊學之中村正直弟子張文成於〈中村正直先生詩跋〉中，亦形容其詩風曰：

88 前引《明治的漢學家》，頁147。

89 前引《中村敬宇》，頁12。

90 前引《中村敬宇》，頁13。

91 前引《中村敬宇》，頁14。

92 《敬宇詩集》，中村正直歿後，其嗣子中村正一於1926（大正15）年刊行，分上中下三冊，共計四卷。上冊有晚清第二任駐日公使黎庶昌（1837-1898）之序文，收錄《青衿集》157首、《峽中集》25首；中冊收錄《聖林集》17首、《扈駕集》28首、《浮海集》26首、《嶽南集》68首、《百笑百妙》35首；下冊收錄晚年之作《礫川集》212首。中村正直之詩集現藏於日本國會圖書館及慶應義塾大學「斯道文庫」、「安井文庫」。

93 黎庶昌，《敬宇詩集》序，寫於1889（光緒15）年，收入《詩集日本漢詩》（東京：汲古書院，1985），卷18，頁433-434。

今先生之詩，非風騷，非漢魏，闢古人之蹊徑，成一家之至言，具有真意，不失正軌。<sup>94</sup>

王韜則稱讚中村正直「至君獨以儒學顯，文章倜儻稱一時」，<sup>95</sup>並贈詩一首曰：「修文館裏曾相見，知是騷壇擅盛名，自愧東遊真草草，未攜行卷謁先生。」<sup>96</sup>表露訪日期間未能把握機會，針對漢學興衰問題與中村正直深入對談之遺憾。

### 三、王韜與岡千仞

岡千仞，字振衣，幕末、明治時期東北仙台出身之漢學家，曾於昌平黌修習漢詩文，與中村正直、重野安繹同窗，一八六二年與昌平黌舊友松本奎堂（謙三郎，1831-1863）、松林飯山（1839-1867）於大阪開設「雙松岡塾」，結交志士，為尊王攘夷運動奔走。岡千仞於王政復古之際，因對當時保守派之仙台藩政提出倒幕建議，遭受支持幕府派系之反對而被捕下獄。岡千仞於變革時期屢歷波折，自認為不適官途，最後選擇從事國史編纂及漢籍整理工作。

#### （一）西方歷史知識之汲取

在學習西方國家歷史方面，岡千仞與王韜有相同志趣，曾於明治初期編譯《美利堅志》<sup>97</sup>及《法蘭西志》，對於世界歷史知識認知深厚。岡千仞反對執政者之遭遇，與王韜的命運頗為相近。<sup>98</sup>美國哈佛學者保爾柯文（Paul A. Cohen）研究王韜之專著《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中，分析比較了王韜《法國志略》與岡千仞《法蘭西志》二書革命思想之關聯性。<sup>99</sup>

94 張文成，〈中村正直先生詩跋〉，收入《詩集日本漢詩》，頁537。

95 《扶桑遊記》，頁426。

96 同上注。

97 《美利堅志》計四卷，由岡千仞、河野通之共譯，原著者為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於1873（明治6）年，由光啟社刊行。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有刊本。

98 1862年3月太平天國動亂中，因上書「太平軍取上海策」，王韜被清廷冠以「通敵」罪名，要求從上海租界引渡治罪，後接受英國領事庇護，流亡香港。此後王韜遭受官府通緝，成為晚清官僚無法錄用之邊陲人物。

99 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一八七四年王韜在洪士偉、伍廷芳、何啓、胡禮垣等人協助下，創辦第一份華文報紙《循環日報》（*Hsun Huan Jihpao*），自己擔任主筆，從立足中國、放眼全球之視域，發表政論。主要倡導中國應汲取西方文明之優點，主張變法圖強，提出諸多改革政策。這些政論於一八八二年輯入《弢園文錄外編》，與上海《萬國公報》同樣藉輿論傳播喚起晚清知識分子之改革思潮。

王韜從王爾敏描述之落魄文人到變革時代之先知，<sup>100</sup>無論時代背景或命運，岡千仞皆與其有諸多雷同之處。一八七九年二月，岡千仞曾託過境香港之友人佐和東野向訪日前之王韜致意。在其〈送佐和少警視奉使於歐洲序〉中述及：

近讀香港王紫詮《普法戰紀》，服其慮之深而其思遠。東野航過香港，見紫詮質以余言。紫詮遊歐洲，諳海外事情，必知所以變而通之。<sup>101</sup>

岡千仞關注的焦點在王韜《普法戰紀》所記載之海外情勢。

實藤惠秀據《扶桑遊記》統計出王韜四個月訪日行程中，曾與一百十五位日本人士接觸。自一八七九（明治12）年五月十三日王韜抵達橫濱，至同年八月三十一日回上海為止，岡千仞與王韜會面多達二十八次，從二人筆語交談內容，隨處可見岡千仞對王韜的仰慕之情，二人之交情可見一斑。<sup>102</sup>

一八七九年五月十七日王韜初抵東京，岡千仞於翌日晚間即偕《美利堅志》共譯者河野通之走訪王韜，二十一日與栗本鋤雲再訪王韜，當時岡千仞提及：

方今宇內形勢，以俄為急。時人比俄於戰國之虎狼秦，而實為今日亞細亞洲之大患。敝邦與之土壤毗連，尤不可不悉其情偽。《俄志》之譯，為不可緩。先生其有意哉？他日《俄志》若成，明著其利弊得失所在，則五大洲可收之掌握中，何等快事！<sup>103</sup>

岡千仞之話題直接切入俄羅斯威脅東亞局勢，建議王韜翻譯《俄志》，以洞悉俄羅斯國情，分析俄羅斯勢力崛起對亞洲發展之利弊得失。

100 王爾敏，〈王韜在近代中國之思想先驅地位〉，《王韜與近代世界》，頁3-11。

101 1879年2月11日《申報》，收入岡千仞，《藏名山房文初集》（東京府：1920），卷2，頁20-22。

102 王韜與日本人士接觸，以寺田望南37次最多，其次為岡千仞28次，後依序為佐田白茅26次、重野安釋23次、小牧昌業15次、西尾鹿峰14次、栗本鋤雲12次、增田嶽陽及龜谷省軒各11次。詳請參閱實藤惠秀，〈王韜の來遊と日本文人〉，《近代日支文化論》，頁77。本文經張銘三譯成中文，〈王韜的渡日和日本文人〉，《日本研究》3卷6期（1944）。



十九世紀中葉起，晚清之外交政策即視俄羅斯為敵國。普法戰爭之後，敗戰的法國勢力銳減，形成一八七〇年代英法聯盟難以抗衡俄羅斯勢力之新局勢。中國、日本遂成為對抗俄羅斯勢力之關鍵所在。王韜當然也注意到這個問題，於《普法戰紀》結論中述及：

俄既不得逞其西略，則將肆其東封。俄勢日東則其強益甚，舉天下之利權盡歸掌握。英、法至是雖欲爭而不得矣，然則必欲牽制乎俄，天下諸國無能當之者，惟中國則庶乎可矣。<sup>104</sup>

王韜夙來對俄羅斯覬覦中國領土最為警惕，主張「中外合力防俄」、「合六國以制俄」，並於〈中外合力防俄〉一文中提及：

英、法競爽，足以制俄，而東方可幸無事。法蹶普興，而俄又佯與普親，則俄得晏然無忌，專力以圖東方。……若亞洲，則惟中、英、日三國而已，而三國皆不相聯屬，中、日近又隱挾猜嫌，則俄之得志益可知已。……我中國如能結好英、日，以彼為援，互為唇齒，然後勵精圖治，發奮為雄，盛兵備，厚邊防，乃足以有恃而無恐。<sup>105</sup>

王韜認為普法戰爭結果使法國國力一蹶不振，而俄羅斯又與普國交親，其勢力日漸壯大，食髓知味恐轉而覬覦亞洲，唯有中、英、日三國聯手，方足與之抗衡，然中日關係時有間隙，尤其是併吞琉球一事，雙方難有合作共識，令人憂心。岡千仞邀王韜翻譯《俄志》，與下文探討的「興亞論」有高度關連性。

## （二）王韜與岡千仞對「興亞論」的主張

王韜訪日，目睹明治維新改革帶給日本社會種種動變遷現象，對於西方列強入侵亞洲帶來的衝擊，期望中、日二國採行連橫策略因應，以共同穩住亞洲政局。其〈跋日本《岡鹿門文集》後〉中述及：

夫日之變法，志在自強，初不謂其弊之至於此也。夫西法非不可學，而其所以治民生立國本者，要自有在。且日本之於中國，昔則可以閉關絕使，畫疆自守。今則萬國來同，舟車畢集，以亞細亞洲之大局而論，方當輔車唇齒之相依。且以地勢觀之，日本之在東洋，譬

103 王韜，《扶桑遊記》，頁412。

104 《普法戰紀》，「光緒丙戌（1886）仲春，陽湖汪學瀚署檢」本（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卷20，頁44。

105 王韜，〈中外合力防俄〉，《設園文新編》，頁74-75。

諸中國之門戶也。<sup>106</sup>

王韜認為日本學西法謀求自強，無可厚非，但須保有其所以治民生立國本者。「輔車相依、唇亡齒寒」道盡中、日二國息息相關、密不可分之關係。王韜同時憂心日本變法成功而過度自我膨脹，明白警示曰：

乃日本徒以能效西法，侈然自大，凌侮中朝，急欲輕於一試，是直不明利害之端，而昧於維持之義者已。想日本有識之士，當必為之痛哭流涕而長太息者也。<sup>107</sup>

針對當時中、英、俄三國關係，王韜則表示：

至今日而中國之安危強弱，在善處英、俄之間，而英、俄安危強弱之所繫，亦在乎中國。……故英、俄在今日，亦莫如結中國以自重，而中國亦宜聯絡於二者，以恆享其安。<sup>108</sup>

善用其間矛盾，靈活採行合縱連橫策略，將可恆享安樂。

王韜對於當時國際局勢看法誠如上述內容，而其〈中東名士〉一文中，則言及岡千仞之國際認知，曰：

鹿門曾著《米志》、《法志》，於泰西情形，瞭然若指諸掌。近又譯《英志》，已得二卷，視慕維廉所撰，言簡而事增，誠不朽之盛事也。<sup>109</sup>

讚賞岡千仞對美、法、英各國國情瞭如指掌。於〈跋岡鹿門《送西吉甫遊俄文》後〉一文中更說道：

鹿門之志，常欲中、日相睦，聯英以拒俄。夫就亞洲地勢以觀，中之與日，固所謂唇齒相聯，而輔車相依者也。鹿門往時酒酣耳熱，輒縱談天下大計，灑灑成議，幾欲擊碎唾壺，而蒿目時艱，愴懷近事，每憤其志之不得伸。嗚呼！欲維持亞洲之大局者，其盍於中、日輯和加之意哉！<sup>110</sup>

指出岡千仞志在推動中日相睦、聯英抗俄，每嘆其志不得伸。頗有英雄所見略同、相知相惜之慨。

106 王韜，〈跋日本《岡鹿門文集》後〉，《弢園文新編》，頁143。

107 同上注。

108 王韜，〈遣使親俄〉，《弢園文新編》，頁77。

109 王韜，〈中東名士，收入《扶桑遊記》〉，《弢園文新編》，頁361。

110 王韜，〈跋岡鹿門《送西吉甫遊俄文》後〉，《弢園文新編》，頁145。

在文學領域交流中，岡千仞曾以王韜弟子自居，二人把酒同歡之際，除了談論如何振興漢學教育外，更論及亞洲情勢與中、日、英聯合抗俄等問題。王韜原本期待岡千仞對其一連串呼籲中日合作之言論能有所作為。但岡千仞反應卻出奇冷淡，雖然曾為王韜《扶桑遊記》寫跋，卻未見對興亞論的問題作出回應。針對日本併吞琉球的問題，岡千仞寫《沖繩志序》，與中村正直之反對立場南轅北轍。易惠莉指出岡千仞認為琉球是「一島兩屬」，其政治地位不被國際公法承認，容易被西方列強藉機侵佔，表明日本併吞琉球有利穩定亞洲大局。<sup>111</sup>岡千仞曾於東京與王韜前後面談二十八次，當然知道王韜反對日本併吞琉球之立場，因此採取消極迴避之處理方式。於是王韜認為「鹿門之志，常欲中、日和睦，聯英以拒俄」之錯覺持續存在。直至一八九〇年編輯《重訂法國志略》，參考岡千仞之《法蘭西志》內容時，終於發現其讚揚豐臣秀吉(1936-1958)出兵攻打朝鮮乃「鞭撻群雄，戡定亂略，威震於海外」，<sup>112</sup>以及其他諸多贊同歐洲因戰爭贏得富強文明之主戰論點。王韜因而嚴加批評曰：

與法之窮兵黷武不以為可戒，而反以為可法，此殆近於浮浪子弟倡為尊攘縱橫之說者，而不意出於儒士之口也，吾無取爾也。<sup>113</sup>

王韜的《普法戰紀》提供中日二國「以弱敵強」之轉機啓示，然而對此轉機各有不同解讀。王韜與岡千仞之取經模式同為探究西方國家歷史演變，以應用於自國之改革經驗，方法雖然相同，但在策略上，王韜主張防止俄國勢力擴大，屬於防衛性思維，是立足於同一平台之中日合作的「興亞論」。岡千仞希望王韜翻譯《俄志》，目的則在延續其《美利堅志》、《法蘭西志》、《英志》之完成，以便「將五大洲收於掌握之中」，傾向侵略性思考，是日本凌駕於中國之上的「興亞論」，因此雙方難有交集。

### (三) 《循環日報》對日本之評論

王韜創辦的《循環日報》有八成以上篇幅在談論國際事務，主題除東亞之日本、韓國、琉球及臺灣等問題外，舉凡歐美、俄羅斯、東南亞、中東、非洲等地區，只要與中國相關之重要事件，都在論談範疇內。例如不平等條約之改正、治外法權的廢除，或《萬國公法》及其他國際條約與維持世界秩序之相關

111 前引易惠莉論文，頁209。

112 佛猶里著，高橋二郎譯，岡千仞校對《法蘭西志》（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特別買上文庫」清水澄舊藏資料（編號特4021），1878刊本），卷6，頁22。

113 王韜輯撰，《重訂法國志略》（清光緒庚寅十六，1890年松隱廬排印本，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卷4，頁26。

問題均有所涉獵，這些政論稿多彙編成《弢園文錄外編》一書。一八七四年《循環日報》創刊之際，發生日本派兵攻打臺灣之棘手外交問題，王韜對此反應相當敏銳，立即發表〈論日本往剿臺灣生蕃〉（1874.5.23）、〈論日本侵犯臺灣事〉（1874.7.27）等政治評論，嚴厲譴責日本「征臺」之不當舉動。一八七九年王韜訪日之際，又發生日本明治政府強行對琉球實施「廢藩置縣」之「琉球處分」問題，嚴重破壞中日關係。對此，王韜訪日回香港後，先後提出〈辨琉球屬於我朝〉（1880.11.15）、〈論日本經營琉球〉（1881.12.30）、〈論琉球欲圖恢復〉（1882.1.19）、〈論中東商辦琉球事〉（1883.2.19），徹底批判日本對「琉球處分」之不義、不當行爲，同時譴責前琉球王不智，嚴正主張琉球宗主權隸屬中國。<sup>114</sup>王韜與日本知識分子交往後，曾主張親日，幻想「聯日抗俄」、「聯英、日抗俄」等連橫外交政策能夠實現。以下舉王韜與岡千仞之相關書簡，分析二人對「興亞會」（亞洲主義）之看法。

王韜訪日回香港八個月後，日本部分人士爲力振列強入侵亞洲之頹勢，希望中日二國聯手建立抵抗西洋勢力之陣線，於一八八〇年三月成立「興亞會」。王韜聞訊曾寄一封〈與日本岡鹿門〉信函，內容提及：

聞貴國有志之士，近日創設興亞會。此誠當務之急，而其深識遠慮，所見之大，殊不可及。長岡護美、渡邊洪基，皆與韜相識，而為是會長。……其執興亞會中牛耳者，為曾根俊虎、伊東蒙古，咸納交於韜，通縞紵而結苔岑焉。要之，貴國多慷慨激昂之士，國未有艾焉。<sup>115</sup>

「興亞會」會長爲曾任貴族院議員之長岡護美（1841-1906）、副會長爲明治初期遣歐美使節之一渡邊洪基（1847-1901），二人皆爲王韜舊識。會員分「永遠盟員」、「恒常會員」及「通信會友」三種，駐日公使黎庶昌及韓國獨立運動人士朴永孝、金晚植等人都在「永遠盟員」之列，與王韜夙有深交之歷史學家重野安繹（1827-1910）也成爲該會一員。「興亞會」爲求平衡發展，分別於上海、釜山設立分會，創會會員網羅宮島誠一郎、谷干城、岸田吟香、曾根俊虎、伊東蒙古、末廣重恭、廣部精、成島柳、草間時福、桂太郎、東次郎、榎本武

114 西里喜行，〈王韜と循環日報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43（3）（1984），頁86。  
老冠祥〈王韜與《循環日報》〉，前引《王韜與近代世界》，頁354-372。王韜另撰寫〈琉球朝貢考〉、〈琉球向歸日本辨〉、〈駁日人言取琉球有十證〉（卷6）、〈琉事不足辨〉（卷6）、〈日本非中國藩屬辨〉等時政評論，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論證琉球爲中國朝貢國而非日本屬國。

115 王韜，〈與日本岡鹿門〉，《弢園文新編》，頁300。

揚、牧野伸顯、副島種臣、三島毅、品川彌二郎、原敬、竹添進一郎等日本產官學界重要人士達一百六十餘人。清朝方面加入會員者多達二十六人，連當時駐日公使何如璋、直隸總督李鴻章都曾受邀，但何如璋因處理敏感的琉球問題而辭退，李鴻章則以外交辭令予以婉拒。<sup>116</sup>王韜贊同該會宗旨，在曾有過交往的日本海軍士官曾根俊虎（1847-1910）極力邀請下，成為創會會員之一。「興亞會」於一八八三年一月更名為「亞細亞協會」，一九〇〇年三月被納入「東亞同文會」組織。

「興亞會」於一八八〇年七月開始出版《興亞會報告》，由曾任中村正直《同人社文學雜誌》編輯之吾妻兵治（1853-1917）及漢學家岡本監輔負責出刊，至一八八五年九月止，該報共發行十八期。<sup>117</sup>這段期間，東亞除了發生中、法戰爭外，日、韓之間亦爆發「甲申事變」；日本國內則有思想家福澤諭吉積極鼓吹「脫亞入歐」論。歐洲勢力入侵亞洲以及中日、日韓關係惡化，在在對亞洲未來發展產生負面影響，「興亞會」主要功能即在消弭這股不利亞洲整合之潮流。

「興亞會」成員都是當時主張民權思想，熱衷中日連橫之論者。為方便與東亞各國交換情報及溝通意見，吾妻兵治及岡本監輔編輯的通訊雜誌《亞細亞協會報告》曾經以「漢文」發行，此舉表面上看似與日本全盤西化之社會風潮背道而馳，其實具有振興漢學，與洋學互別苗頭之意涵。王韜告知岡千仞，表明對「興亞會」樂觀其成，主要因為該會致力亞洲文化交流之提升，同時擬透過諸如鐵路、電線、船艦、機械等經營權、通商貿易之發展，收回西方列強在亞洲佔有的既得利益市場，以達成富強之道。王韜對岡千仞提及：

國體不立，受制於異邦，非亡乎？國力不贍，仰給於異邦，非亡乎？  
今夫制度文物，一模擬於彼，法制禁令，為彼所掣肘，謂之國非其國。<sup>118</sup>

認為國家並非失其主、易其地才算亡國，從經濟層面脫離西洋列強之掣肘，是變法圖強之重要關鍵。

王韜於《循環日報》〈論日本設興亞會〉（1880.4.29）之論談中，冒頭先稱讚「興亞會」之成立是「振興亞洲大勢，昌盛國運，迅速與歐洲並駕齊驅」，「學習中國、高麗的語言文字，得知政治之得失、教化之盛衰以謀求改善，實

116 狹間直樹，〈初期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史的考察（5）〉，《東亞》（2001）。

117 狹間直樹，〈中國近代における帝國主義と國民國家—日本のアジア主義との関連において〉，《西洋近代文明と中華世界》（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1），頁14。

118 王韜，〈與日本岡鹿門〉，前引《菽園文新編》，頁142。

有大志深計，週慮熟誠。」但是爾後王韜對日本併吞琉球耿耿於懷，因此在〈論中日當釋嫌〉（1880.5.14）中，嚴厲批評指出：日本對外以防強鄰，對內以鞏固國基為目標而成立「興亞會」，其志理應嘉許；會員（曾根俊虎）等訪我之際，陳述中日兩國，唇齒輔車，必須緊密結合之宗旨，若果，兩國應以「誠」與「公」交往，但是日本將原屬中日兩國的琉球，虜其王，置縣而滅之，此事無論日本作何辯解都難以免除「滅國」之罪；一經中國責問，日本即欲訴諸干戈，此為敦邦睦誼之道？中國之態度是「扶弱國、保小邦，滅興繼絕，仗義執言」；而日本卻「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此為不當取人領土之行徑。日本如此不友善，談與中國和好，實有負「興亞會」之名，日本必須正確處理琉球問題。王韜認為琉球問題解決方法是將中山府歸還琉球王，奉其社稷，此舉不但無損日本國體與國威，且有助存續中日兩國友好關係，歐洲各國亦將對日本之隆情義理給予高度評價。日本只要歸還中山王朝，中國即可與英、日連橫，共防俄羅斯入侵，王韜還說：「興亞的第一義即是中日和好，而中日和好的第一義在於歸還琉球故土」，質疑日本何以不儘速著手處理？關於琉球歸屬問題，李鴻章曾委請訪中之美國第十八任總統克蘭德（Ulysses Simpson Grant，1822-1885）居間調解，克蘭德於一八七九年七月至九月訪問日本並進行調解。當時王韜仍在日本訪問，克蘭德與王韜雖無接觸，但深切感受到琉球問題在外交上漸趨複雜化，而且對中國不利。因此，於《循環日報》再提〈興亞會宜杜其弊論〉（1880.8.16），一反過去支持「興亞會」之態度，嚴厲批評曰：

日本人設「興亞會」，其志大而其名美，但事勢困難，意見分歧，等於無意義的空言，屬於陰謀詭計之類的組織。……改善對外關係的最上策，本應以德感化，其次為恩威並施；惟今日本卻是事端挑釁臺灣，蓄謀琉球，其「睦隣」之偽意，可見一斑，日本雖有多種說詞，咸不可信。「興亞會」之人雖說琉球問題屬日本朝廷之事，渠等毫無責任，但是他們不都是通曉時事之人嗎？

王韜原本寄望「興亞會」能實現中、日連橫以抗禦俄羅斯，在日本政府接二連三之粗暴舉動及「興亞會」成員未能勇於任事之情況下，一一破滅。對於琉球問題，岡千仞在其《觀光紀游》中明白表示日本可不惜與中國一戰、再戰甚至三戰，如此可「雪東洋積年之辱」，可讓「東洋威武震歐土」，顯見其主戰之心。<sup>119</sup>

對於王韜論琉球及俄羅斯二事，岡千仞於〈答王紫詮書〉中表示：

119 岡千仞，《觀光紀游》，卷4〈滬上日記〉（1886，明治19，石鼓亭藏版）。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影印出版，1971），62輯，頁102-103。

接某月日手書，莊誦數回，恍如晤語一堂，蒙惠《遯庵尺牘》論琉球、俄羅斯二事，先自強後戰伐，末界微事不足爭等言，皆經世碩書，憂國丹心，愈服先生識透大事，眼高一世。特怪中土方發大使講洋務而使練達外事如先生者，消精強有為之年於南方孤島之中，真可太息也。<sup>120</sup>

岡千仞除讚佩王韜具前瞻性的變法圖強之世界觀外，對於其懷才不遇，遭晚清官僚邊緣化之處境，表達惋惜之意，至於贊成日本併吞琉球之立場，則始終不曾直接向王韜表明。

#### （四）岡千仞與漢學教育

如前所述，中村正直與岡千仞皆為明治初期認同傳統儒學教化有助日本應對西方列強挑戰之漢學家。一八七九年四月王韜訪日之際，適逢岡千仞接任東京府書籍館幹事之職務。<sup>121</sup>明治維新之後，岡千仞積極推動漢籍圖書之整理與充實，專心經營私塾「綏猶堂」，並於一八八四年五月至一八八五年四月，前往中國旅遊，其間將所見所聞以日記方式完成《觀光紀游》一書，反映明治初期日本知識分子見聞晚清社會之觀感。<sup>122</sup>另著有《在臆話記》、《攘夷紀事》等。岡千仞中國行之主要目的是：

擬航香港見王紫詮（王韜），而後歷游四方。會紫詮書告移居滬上，乃航上海。<sup>123</sup>

未料岡千仞竟意外獲得與李鴻章及盛宣懷對談之機會。

明治初期日本全面汲取西洋文明，導致傳統漢學逐漸式微。儘管適逢福澤諭吉積極鼓吹日本「脫亞入歐」論，但是岡千仞卻仍堅持己見，與中國進行學術交流。岡千仞對日本社會摒棄傳統漢學之現象，曾於〈答王紫詮書〉一文中批評曰：

敝邦交通歐米各國以來，士人學問分為二途，一曰漢學，一曰洋學。敝邦立國實資於中土禮樂文物，其能獨立東表，維持大統二千年，

120 《岡鹿門文稿》（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藏），「特別買上文庫，編號2281-154」。

121 當時東京府書籍館館長一職，由幹事總理館務。參閱中田吉信，〈岡千仞と王韜〉，《參考書誌研究》13（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專門資料部，1976）。

122 岡千仞《觀光紀游》依其旅行地點先後分為十卷。計有〈航滬日記〉（卷1）、〈蘇杭日記〉（卷2、3）、〈滬上日記〉（卷4）、〈燕京日記〉（卷5、6）、〈滬上再記〉（卷7）、〈粵南日記〉（卷8-10）。

123 前引岡千仞，《觀光紀游》，卷1。

復今日之隆運，亦唯以其能服文武周孔之教也。陋邦之於漢學，不可一日少之，僕獨怪今修洋學者皆知遊歐美達其才，而修漢學者未見一人遊中土、研其業。此由其人立志不固，通道不篤宜矣。斯文蕩然掃地一至此極也。僕雖驚已以讀書知文字，為世所指名，豈可旁觀此事，無一所救乎，此僕之所以奮發舉此遊也。<sup>124</sup>

岡千仞指出日本漢學者多未能遊學中國，理論與實際難以結合，無法與積極考察歐美之「洋學者」匹敵。岡千仞這種思維也是日後促成其往赴中國旅遊之動機。

王韜於〈跋日本《岡鹿門文集》後〉中，對維新時期日本傾心西學之社會現象，亦提出批評曰：

日本執政者，又復崇效西法，振興西學，盡棄其舊而新是謀，甚至於改正朔，易服色，冠裳制度，禮樂政刑，俱為一變。而民俗亦漸澆而黠。向之所謂敦厚者，一旦蕩焉泯焉。自不知者觀之，以為富強著效，駸駸乎馳域外之觀。其知之者，或以為失之於太驟，或以為失之於太似。其實所學西法，亦徒襲其皮毛，未得其精，而已囂然自足矣。夫日本地小而瘠，民寡而貧，其外龐然，而其實則外強而中槁。日東有識之士，未嘗不知其弊，咨嗟太息，往往形之於文字之間。<sup>125</sup>

王韜對於重視漢學教育之岡千仞的評語則是：

維新後徵入史館，不久辭官，惟以文字為消遣。拔劍斫地，把酒問天，終由於眷懷家國；然則，鹿門文字之豪，非根於忠愛之心哉！<sup>126</sup>

岡千仞曾任明治政府修史局，東京府書籍館幹事，在一八七八（明治11）年，王韜訪日前一年，因病遭免職之後，專心投入著述工作，<sup>127</sup>一八八一年將自己的作品編輯成《藏名山房雜著第一集》問世。王韜訪日回香港後，有意將岡千仞的五十篇文稿編入其弢園叢書中，故對其文稿曾作修改，並有如下的評論：

鹿門（岡千仞）之文五十篇，乃其畢生精力所萃，其佳處在貽息深厚，詞句矜練，識見透闢，議論暢達。所不足者，有時好為奧古，

124 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藏，「特別買上文庫，編號 2281-154」，岡鹿門文稿。

125 王韜，〈跋日本《岡鹿門文集》後〉，前引《弢園文新編》，頁 141。

126 前引王韜，《扶桑遊記》，頁 412。

127 《岡千仞履歷》，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特別買上文庫」藏，史料編號 3624。



而失之晦塞。今以奔走余暇，披覽數過，並為加墨，有複沓處不恆鄙意者，妄為刪之，想鹿門以予為文字知己，必不怪也。<sup>128</sup>

此外，對於岡千仞致力著述的精神，王韜在《扶桑游記》中亦提及他們以文會友的關係曰：「鹿門性豪爽高亢，以有朋、文字為性命，務欲傳其名於千秋而不使徒死，以為百年事業所系。故一生精神，悉注於是，文多激昂慷慨，深沈刻摯」。<sup>129</sup>

#### 四、結語

王韜「中體西用」之思想形成，如同其對日本藏書家增田岳陽所言：「讀書十年，行萬里路。拔劍斫地，把酒問天」般，身體力行、知己知彼、汰舊佈新是其汲取世界新知識之方法。王韜以汲取書本理論知識為縱軸，以「逍遙海外作鵬遊，足遍東西歷數洲」、<sup>130</sup>「經歷數十國，往來七萬里，波濤助其壯志，風雨破其奇懷，亦足豪矣」<sup>131</sup>之心境遊歷世界為橫向。認為中國「如欲真致富強，無論中法，無論西法，皆可以臻實效。首在乎上下一心一力，悉專工致志於此。」<sup>132</sup>若能君民一體，則「下情得以上達，上惠得以下逮，無隔閡之弊，無掩飾之虞，不必西法，自可以臻富強，天下事在乎得人而已。」<sup>133</sup>

在王韜《扶桑遊記》細膩且寫實之紀錄下，日本明治維新種種革新帶給晚清社會值得借鏡參考之內涵。雖然王韜是晚清改革當權派李鴻章等人心目中的邊陲人物，但仍然希望中國人能除去因循、苟且、蒙蔽、粉飾、貪罔、虛矯等陋習，建議改變傳統取士之法、練兵之法、學校之虛文、律例之繁文等舊規。<sup>134</sup>希望以新思想、新處方，破除晚清官僚「我用我法以治天下，自有聖人之道在」這種狂妄而不知因時制宜之舊思維與陳腐制度，並冀望中國能透過變法革新與國際社會接軌。

128 1880年5月22日《郵便知報新聞》。

129 前引王韜，《扶桑遊記》，頁412。

130 鍾淑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接觸東西洋文化的前驅者》（臺北：百川書局，1989），頁187。

131 王韜，〈《漫遊隨錄》自序〉，前引《弢園文新編》，頁352。

132 王韜，〈論所談洋務終難坐言起行〉，《弢園文新編》，頁348。

133 同上注，頁350。

134 王韜，〈變法（中）〉，前引《弢園文新編》，頁16-17。

日本學者大谷敏夫稱讚王韜是「中國最早具有國際感觀的文人」，<sup>135</sup>王韜與中村正直及岡千仞之互動，影響了彼此的思想變遷，對王韜而言，或許是始料未及之事。王韜在中國經歷了清朝與太平天國、傳統與西洋文明、洋務派與反洋務派之間衝突；在日本也親眼目睹「漢學」與「洋學」之論戰。這些觀點之差異性，促使他經常重回問題發生原點，從中思考解決問題之道。王韜與中村正直二人藉由翻譯的媒介，發揮了西學東漸之功能，二人都有以民為重的思想。而王韜的「重民」是君民上下對舉，人民不是一種獨立身份；中村正直主張的人民自主自立權，等同於立國的自主自立權，不將人民以獨立身份看待。在宗教觀方面，二人均認為基督教教義或儒教學說都必須透過實踐才能普及於社會，用之於人民。對於日本的漢學教育，中村正直主張必須具有實用性，方能與洋學結合，而不至於從日本社會消失。

王韜與岡千仞的思想比較，則透過二位學習西方各國歷史之途徑，探討他們對「興亞論」的看法。王韜與岡千仞向西方取經方法雖然相同，但在策略上，王韜主張防止俄國勢力擴大，屬於防衛性思維，是立足於同一平台之中日合作的「興亞論」；岡千仞希望王韜翻譯《俄志》，目的在延續其《美利堅志》、《法蘭西志》、《英志》之完成，以便「將五大洲收於掌握之中」，傾向侵略性思考，是日本凌駕於中國之上的「興亞論」，因此雙方的思維模式，大相逕庭，並無交集。

岡千仞評王韜是繼魏源之啓蒙思想家，而重野安繹更推崇王韜影響日本超越魏源。王韜則強調魏源受困於中國陳腐、保守，難以走向世界，致無法真正瞭解西洋國情，故不能相提並論。但是對德川幕末的日本而言，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之禦侮邏輯，無疑是先進且實用的思想。

王韜為消弭西洋諸國對中國之誤解詬病，提倡發行西文日報以拯救時局。曾以報人的立場，語重心長地說：

英、美兩國每日印至二十萬紙，分布遐邇。日本效法西人，倡行西字日報，歐洲之人見之，皆揚日本而抑中國。近在中國內地所設西人日報，其於中國往往毀多而譽少。於是未到中土之西人，從而疑我中國。此其利害所係實深，今擬我國人之通中西文字者，隨時駁詰，以究指歸。英國、日本均宜有人在彼日報中，論列是非，俾西人知我中國之實，而不至虛蒙疵詬。此亦大有救於時局者也。<sup>136</sup>

135 大谷敏夫，〈清末開港後の文教政策と文人王韜に関する一考察〉，《追手門學院大學文學部紀要》36號（2000），頁13。

136 王韜，〈代上黎召民觀察〉，《淞園文新編》，頁282。

王韜認為日本創西字日報，適時正確地為日本宣傳，有助於西方國家對日本形象之提升；反觀晚清，任憑設於中國之西字日報損毀中國而無人予以駁斥。因此主張應請通中西語文的中國人進入西報評論是非，以改正晚清在國際社會之形象。

王韜訪問日本雖只有短短四個月，但備受維新人士禮遇推崇。訪日後，對其一日千里之進步情形表示震驚，曰：

日本，海東之一小國耳，一旦勃然有志振興，頓革平昔因循之弊。其國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仿效取則，惟恐其入之不深。數年之間，竟能自造船舶、自製槍砲、練兵、訓士、開礦、鑄錢，並其冠裳文字，屋宇之制，無不改而從之。<sup>137</sup>

王韜訪問日本，見識了資本主義社會中政治、經濟、教育及生產技術日新月異之過程，再度印證其堅持中國必須變法圖強之必要性。從活絡中日文化交流、促進雙方吸收西學之思想變遷的收穫而言，可謂不虛此行。王韜從一位報人的立場出發，以身體力行的處世哲學，為中國的發展與再生把脈，透過其主持的《循環日報》，針對國內、國際種種問題，依其獨特見解，言人之不敢言；並以積極態度，多方與外國知識分子、思想家接觸，確立了具國際觀之政論家形象，這也是王韜深獲日本維新人物青睞之主要原因。

王韜古稀之年，目睹晚清於甲午戰爭被日本打敗之悲劇，對於曾經致力「中、日連橫」、「興亞論」，奔走中日交涉之王韜而言，這種結果絕非樂見。不過，於中日文人交往情境中，王韜對日本愛恨交加之思維永遠不會褪色。王韜於《漫遊隨錄》自序中回憶感嘆：

余至日本，見重於日本亦然。往從諸名流後，偕遊日光山，每經險處，必使八人舁余轎，諸人前後擁護，行歌互答，以解舁者之勞。余將返國，同人餞余於中村酒樓，不期而會者百餘人。余位列星使上，衣冠宴集之盛，向所未有。諸名流之寵異余也如此。余窮於世，而獨得此於異域之人，數萬里外之文士，抑何幸歟？<sup>138</sup>

137 王滔，〈變法自強〉下，《弢園文錄外編》，卷2，頁40-41。

138 王韜，〈《漫遊隨錄》自序〉，《弢園文新編》，頁353。王韜於《弢園老民自傳》中亦提及訪日時之盛況曰：「既至日東，遍歷崎陽、神戶、浪華、西京諸名勝。居江戶者十旬，遍交其賢士大夫。一時執贄請受業者，戶外屢滿。壺觴之會，壇坫之開，無日無之。唱和諸作，頗有豪氣。中又為日光山之遊，遍覽諸瀑布，窮其幽邃。老民將歸，日之賢士大夫餞別於中村酒樓，星使參贊以下至者百有餘人。日人謂自開國數千年來所未有也。」

王韜空有滿腔救國、救民情懷卻壯志難伸，晚年自嘆：

嗚呼！余雖甚潦倒不才，為世所棄，而承日東諸君子視余若魁儒碩彥，巨人長德，因何修而獲此況乎。看花載酒，則竝有同情；攬勝探幽，則咸耽夙好。文字之間，尤極沆瀣，途中多唱和之作，然則此遊也，豈徒流連景光而已哉！<sup>139</sup>

雖然王韜訪日，曾有過沈溺於飲酒作樂之插曲，晚年又因吸食鴉片，為毒害所困，致部分日本人士對他有過負面評價，但這些皆不影響王韜對中日文化、思想交流所作的貢獻。如同朱維錚於《弢園文新編》導言所述一般，王韜已經通過自稱為「逸民」、「老民」、「廢民」，一世飄零和醒目言論，於晚清思想界留下一道印痕。<sup>140</sup>

139 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藏，「特別買上文庫，編號 2281-248-15」。

140 朱維錚，《弢園文新編》導言，前引《弢園文新編》，頁 13。

## 引用書目

### 一、史料

慕維廉 (William Muirhead) 著，岡千仞、河野通之共譯，《美利堅志》計四卷 (1873，明治6，光啓社刊行，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本)。

王韜輯撰，《重訂法國志略》(清光緒庚寅(十六)年(1890)松隱廬排印本，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卷4。

佛猶里著，高橋二郎譯，岡千仞校對，《法蘭西志》(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藏「特別買上文庫」清水澄舊藏資料——史料編號特4021，1878刊本)，卷6。

《清使筆語》，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藏(「特別買上文庫」，史料編號2281-248-15)。

《岡鹿門文稿》，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藏，「特別買上文庫」，史料編號2281-154。

〈岡千仞履歷〉，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藏「特別買上文庫」，史料編號3624。

〈王韜書簡〉，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藏，「特別買上文庫」，史料編號2281-248-15。

王韜，《弢園文錄外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

王韜著，陳尚凡、任光亮校點，《扶桑遊記》(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王韜，《扶桑遊記》，收入鍾淑河，《走向世界叢書》(湖南：嶽麓書社，1985)。

李天綱編校，《弢園文新編》(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香港：三聯書店，1998)。

1873年12月26日《循環日報》。

1874年7月9日《循環日報》。

1874年5月23日《循環日報》。

1874年7月27日《循環日報》。

1874年11月15日《申報》。

1874年11月24日《循環日報》、《申報》。

1879年2月11日《申報》。

1879年10月1日《申報》。

1879年9月9日《郵便報知新聞》。

1880年4月29日《循環日報》。

1880年5月14日《循環日報》。

1880年5月22日《郵便知報新聞》。

1880年8月16日《循環日報》。

1899年9月《清議報》第28號。

## 二、中文論著

### 1. 專書

丁韞良，《天道溯原》，出版地未詳，文泉影印出版，1967。

鍾淑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接觸東西洋文化的前驅者》，臺北：百川書局，1989。

忻平，《王韜評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

張海林，《王韜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

柯文著，雷頤、羅檢秋譯，《在傳統與現在性之間——王韜與晚清革命》，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林啓彥、黃文江主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0。

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明治的漢學家》，臺北：學生書局，2002。

### 2. 單篇論文

朴庵，〈王韜與理雅各〉，《國風》創刊號，1934。

呂實強，〈王韜評傳〉，《書和人（國語日報）》61期，1967。

呂實強，〈王韜〉，《中國歷代思想家1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更新版，1999。

賴光臨，〈王韜與循環日報之研究〉，《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上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

王爾敏，〈王韜早年從教活動及其與西洋教士之交遊〉，收入林治平主編，《近代中國與基督教論文集》，臺北：宇宙光出版社，1981。

蘆濱玲，〈漫遊東西洋的清朝文人王韜〉，《中外文化交流》3期，1997。

李朝津，〈儒家思想與清末對外關係的再思考——王韜與日本〉，林啓彥、黃文江主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圖書公司，2000。

周佳榮，〈在香港與王韜會面——中日兩國名士的訪港記錄〉，《王韜與近代

世界》，香港：香港圖書公司，2000。

王曉秋，〈王韜日本之遊補論〉，《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圖書公司，2000。

稂艷玲，〈海外遊歷與王韜思想的發展〉，《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卷30，2001。

孫邦華，〈西潮衝擊下晚清士大夫的變局觀〉，《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1年6期。

易惠莉，〈日本漢學家岡千仞與王韜——1860-1870年代中日知識界的交流〉，《近代中國》，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02，12輯。

王晴佳，〈中國近代「新史學」的日本背景——清末的「史界革命」與「文明史學」〉，《臺大歷史學報》32期，2003。

段懷清，〈理雅各與晚清中國社會〉，《漢學研究通訊》24：2（總94期），2005。

### 三、日文論著

#### 1. 專書

明治文化研究會編，《明治文化全集》，卷5，東京：日本評論社，1967。

勝本清一郎編，《透谷全集》，卷2，東京：岩波書店，1970。

岡千仞，《觀光紀游》，卷1，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1971，62輯。

栗本鋤雲著，日本史籍協會編，《匏庵遺稿》，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5。

增田涉，《西學東漸と中國事情》，東京：岩波書店，1979。

斯邁爾斯(Smiles Samuel)著，中村正直譯，《西國立志編》，東京：講談社，1981。

中村正直，《敬字詩集》，收入《詩集日本漢詩》，卷18，東京：汲古書院，1985。

高橋昌郎，《中村敬字》，收入日本歷史學會編集，《人物叢書》，東京：吉川弘文館，1988。

佐藤慎一，《近代中國の知識人と文明》，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6。

唐權，《海を越えた艶ごと——日中文化交流秘史》，東京：新躍社，2005。

#### 2. 單篇論文

布施知足，〈王紫詮の扶桑遊記〉，《遊記に現れたる明治時代の日支往来》，東京：東亞研究會，1938，頁22-23。

- 實籐惠秀，〈王韜の来遊と日本文人〉《近代日支文化論》，1941。張銘三中譯，〈王韜的渡日和日本文人〉，《日本研究》3卷6期，1944。
- 實藤惠秀，〈岡千仞の支那論〉，《明治日支文化交渉》，東京：風光社，1943。
- 増田涉，〈王韜について—その輪郭〉，《人文研究》14卷7號，1963。李永熾中譯，〈王韜試論〉，《大陸雜誌》34卷2期，1967。
- 中田吉信，〈岡千仞と王韜〉，《參考書誌研究》13，1976，國立國會圖書館專門資料部。
- 松村操編，〈敬字先生詩文偶抄〉，《文學》33卷10號，1881。
- 宮城公子，〈日本の近代化と儒教的主体〉，《日本史研究》295號，1987。
- 西里喜行，〈王韜と循環日報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43（3），1984。
- 伊原澤周，〈《棧雲峽日記》《扶桑遊記》について〉，《日本と中國における西洋文化攝取論》，東京：汲古書院，1999，頁120-151。
- 大谷敏夫，〈清末開港後の文教政策と文人王韜に關する一考察〉《追手門學院大學文學部紀要》36，2000。
- 陶德民，〈明治漢文界における清代文章学の受容——星野恒編・王韜評《明清八大家》について〉，《江戸・明治期の日中文化交流》，東京：農山漁文協，2000。
- 陳建平，〈王韜の日本觀——《扶桑遊記》及び《郵便報知新聞》を中心に〉，《江戸・明治期の日中文化交流》，東京：農山漁文協，2000。
- 狹間直樹，〈初期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史的考察〉1-3，《東亞》2000-2001。
- 狹間直樹，〈中國近代における帝國主義と國民國家—日本のアジア主義との關連において〉，《西洋近代文明と中華世界》，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1。



# A Comparative Study on Wang Tao and the Intellectuals of the Meiji Restoration

Shyu, Shing-ching\*

## Abstract

As an avant-garde thinker, Wang Tao (1828-1897) was a scholar, a newspaperman, an educator, a political critic and a historian. During the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he was devoted to cultural exchanges and the Reformist Move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tudy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and consequent development of Wang's thought and that of the intellectuals of the Meiji Restoration, such as Masanao Nakamura (1832-1891), and Senjin Oka (1833-1914).

Among th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who argued for assimilating Western knowledge, Wang identified himself with Wei Yuan (1794-1857) and considered himself a vanguard in comparison with Kang Youwei (1858-1927) and Huang Zunxian (1848-1905). Going abroad was a turning point in Wang's life. His belief in strengthening a country through political reformation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intellectuals of the Meiji Restoration. When Wang left for Japan in 1879, the Meiji Restoration had just begun. The Japanese were absorbed in studying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order to introduce reforms. Wei's two books, *Sheng Wu Ji* and *Hai Guo Tu Zhi*, were introduced during the late Tokugawa Bakuhō period. Wei's central ideas in coastal defense, "to learn from foreign tribes their special skills in order to subdue them," awakened many Japanese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ians to the importance of knowing the Western world. Wang's *Pu Fa Zhan Ji* (Commentaries on the Franco-Prussian War) also became an essential reference for the Japanese both in and out of government who were intent on understanding the trends in world affairs. The new thoughts of Wei Yuan and Wang Tao complimented each other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es of both Japan and China, and acted as a bridge for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intellectual fields of the two countries.

The main topic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1) to discuss how Nakamura and Oka responded to the reformation ideas advocated by Wang by exploring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analyzing their comments on Wang to make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houghts of both sides; (2) to compare how they maintained the values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and how they absorbed Western knowledge, by using new historical data to discuss the interac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s of both countries and the changes of their thought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Keywords:** Wang Tao, Nakamura Masanao, Oka Senjin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